



2018年1月 第7期

言思录

有学术的思想 有思想学术

孙会军：葛浩文和他的新时期中国小说译介

陈科芳：外宣译作的读者视角分析

《道连·格雷的画像》主题书评

博士文汇 资讯长廊

《言思录》（第8期）征稿启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会博士沙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博士沙龙工作坊

投稿邮箱：

sisusaloon@163.com

起源于一个想法，开始于
一种信念，发展于一种坚
持，致力于一种精神……
给学术以尊严！



封面图片：清彩鳞宝相花纹锦(局部)

来源：故宫官网

《言思录》第7期

顾问：赵蓉晖，杨雪莲

本期特约顾问：张金凤

指导：田昊罡，丁娟，盛攀峰

策划：吴林璞，李静，陈岑

主编：金铭，杜新宇，吴林璞

采编：谷明杰，苗雨婷，沈晶，吴昊，王熠珂

美编：徐沁然，王弘源，杨叶文

葛浩文和他的新时期中国小说译介

主讲人介绍：

孙会军，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改革开放以来英美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以及中国新时期小说在英美的译介。主要学术成果包括：《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域下的翻译研究》（专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49-2008）》（副主编，译林出版社，2009），《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导引》（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以及《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专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另外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翻译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近 40 篇。

一、从《我不是潘金莲》说起

我本次讲座的主题是“葛浩文和他的新时期中国小说译介”。所谓新时期，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间。今天我想从《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说起，前日我开车回家经过电影院，



看到了这部电影的广告。这部电影原定 9 月 30 日公映，但是又推迟了。

电影的导演是冯小刚，主演是范冰冰，电影虽然还没有在国内公映，但

在国际上已经拿到三项大奖了。一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评委组委会认为女主人公李雪莲的经历是一种卡夫卡式的

挣扎，认为导演把电影的形式和内容玩得很高级。该奖被誉为奥斯卡的风向标，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冯小刚得奖

后就说：国际影评人评价这么高，他的野心也就了。哪个档期冷，就去哪个档。所以原来是 9 月 30 日的电影就推迟到了 10 月、11 月。

奖获没几天，电影又在西班牙的电影节获了两个奖项，一是电影节最高的荣誉金贝壳奖，二是女主角范冰冰的最佳女主角银贝壳奖。电影罕见地包揽了电影节两项重要大奖，中国电影又一次征服了国际电影节挑剔的评委。冯小刚曾说：《我不是潘金莲》一部很中国的故事，里面有很多中国化的东西，这部分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有所损失，对于国外观众的喜爱，他挺意外。

电影原著的作者刘震云在小说的多个国家的译本里都要求译者写序，起码简单的介绍一下潘金莲是谁。在电影中，“我不是潘金莲”如果被翻译成 I' m not Pan Jinlian 是肯定不行的。为什么，潘金莲大家都很熟悉，但外国人对此一无所知，翻译时的解释就十分必要了。但是事情解释起来很麻烦，要从宋朝讲起，宋朝的潘金莲说完还得说当今的潘金莲，当今的潘金莲在小说里又叫李雪莲。电影情节是这样的：女主角农村妇女李雪莲和她的丈夫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意外的怀孕又马上要生二胎。但是因为时候的计划生育政策，二胎不能上户口。于是他们商量假离婚，给孩子上了户口，再复婚。可是没想到李雪莲和丈夫离了婚以后，丈夫假戏真作又和别人

好上了，而且让第三者有了身孕。李雪莲觉得很不公平，想要走关系证明自己没真离婚，但是他们的离婚是符合法律的。她去告她的丈夫，说离婚是假的，她丈夫反而诬陷她是潘金莲，说她在结婚前和别人好过。于是李雪莲又开始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之后又闹出了买凶杀人和上访的闹剧。

整个电影就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反映，一个一个的悲剧，就是对政治生活的讽刺。电影里李雪莲被人家叫做小白菜，被丈夫叫做潘金莲，自己又觉得比窦娥还冤，这几个称呼，每个都有深厚的历史背景。葛浩文在翻译时怎么处理？电影在上映前，没有人知道。但是电影的原著是葛浩文和他夫人合作翻译的，小说的名字被译作：I Am Not Madame Bovary。我在亚马逊上查看了 I Am Not Madame Bovary 的书评，一共只有六个评价，均分 2.5 分，评论的两极化非常严重，这同时也反映了在国内广受关注的作品，在英语世界则不然，译者翻译的效果是不理想的。

二、抗争与顺从：

葛浩文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译介

葛浩文是开始翻译到现在，先是

单枪匹马，后来有了他妻子的帮助，翻了将近六十部作品，这实际上是孤独的旅程，尤其是他在西方读者中的反响并不是很理想。但是，葛浩文的作品是在学界是受到好评的，因为外国的学者最为关注的就是中国作品中反应社会问题的题材。除了《我不是潘金莲》葛浩文还翻译了刘震云的许多作品。据责编的透露，葛浩文有志翻译刘震云的全部作品，除了目前已经出版的《手机》、《我叫刘跃进》以外，还有《一句顶一万句》、《一地鸡毛》等也会陆续被译介到国外。

今天我要向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葛浩文。我觉得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翻译成就，二是因为他的争议性，第三是因为他曾在国际上获得过多个奖项。

葛浩文的翻译历程就是中国新时期的一部文学史，他的翻译几乎囊括了时期所有重要的作家和作品。简单看一下他的翻译成果：

莫言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四十一炮》、《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爆炸》、《变》、《蛙》、《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商市街》、《染布匠的

女儿》、《萧红短篇小说选集》，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米》、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手机》、《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冯骥才《三寸金莲》，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王安忆《富萍》、《流逝》，贾平凹《浮躁》、《废都》，李锐《旧址》，朱天文《荒人手记》等等数不胜数。

美国的文学翻译领域中，学者是怎么评价葛浩文的？有人把他称为中国文学在美国的接生婆，是西方中国文学领域的首席翻译。谭纶镁对他评价道：中国文学作品通过他的翻译在西方获得了读者，使西方读者认识到在中国也有可以和米兰昆德拉的马尔克斯相同相提并论的译者；清华大学的王宁说：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和陈安娜将莫言的作品翻成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的获奖至少延宕十年，或许他一生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

他的成就同时是学术上的。在国外专门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期如：Chinese Lecture、《路灯》等上，葛浩文都扮演过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南京译林出版社老社长李景端写过一篇文

章，说连译带改的翻译不可提倡，他这就是在批评葛浩文，认为他在翻译莫言的时候的这种做法不好，虽然他成就了莫言。葛浩文他自己不觉得连译带改有什么问题，他在文章中给自己的翻译贴了标签：简单地说，就是翻译可以连译带改。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葛浩文甚至把原作的结尾处改成了相反的结局。

葛浩文认为原文结尾写得没劲，就和莫言商量改动了结局。他就像一个媒婆一样要把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西方读者怎么喜欢，他就通过翻译把作品怎么调整。但他的调整是征得作者同意的，是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互动和合作，这样的互动是任何翻译活动可遇不可求的。

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葛浩文断定出版社一定会对作品做很大的改动，相当程度的补充是免不了的。所以他就尽量直译出来，让出版社来决定内容的增删、结构的重组和语言的本地化。在翻译《红高粱家族》时，葛浩文也是经过莫言的同意把十几页比较冗长啰嗦的内容删掉了。葛浩文另外还改动了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姓名、时间逻辑上的错误。

莫言的创作本身就有汪洋恣肆的特点。他开始写一部作品的时候总是充满激情的，但写到后面他的心思在构造下一个作品了，导致后面的写作粗枝大叶。翻译《丰乳肥臀》改动同样也比较多的。但是这些改动基本都是莫言自己改的，因为他交给葛浩文的就是升级过的中文文本。

在英语世界中，小说经过出版社的编辑才能出版这是很正常很普遍的现象。因为中国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用的比较边缘的位置，所受到出版社的影响就更大出版被删减的命运的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文学相比其他国家的文学，遭到的删减更为严重，有时甚至会另起炉灶重新改写。编辑其实也在出版的过程中干预了文本。翻译家葛浩文被贴上连译带改的标签，让他觉得自己很冤枉，因为对小说删减的大都是出版社的编辑，他的翻译大部分都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修饰。他曾经说：“有人指责我连译带改，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就听不出来他到底是夸我还是批评我，反正我觉得特别刺耳，因为我在翻译的时候都是很严谨的，出版社让删，经过了作者的同意，我却成了背黑锅的。”

葛浩文译文的语言风格有什么特点呢？有一位学者做了一个包含十个葛浩文译本的语料库。这项语料库研究指出，在词汇层面上，葛浩文译文的用词虽然不复杂，但绝不单调，词汇丰富多变。也就是说葛浩文在处理词汇时，非常地审慎认真，展现了一个优秀译者的素养。在句子层面上，译文的平均句长低于原文，反映了译文较强的可读性。就此可以说，葛浩文的翻译时比较好的。我们这里谈到了葛浩文的第一个争议，他自己并不承认自己的翻译实在连译带改，他同时认为，任何改动都是为了更好地译介。

葛浩文的另一个争议在于有学者认为他是东方主义的翻译官。这个观点来自于我非常尊敬的江玉琴老师和乔国强老师的一篇文章。以前大家在谈到葛浩文的翻译时都一边倒地称赞他，而这篇文章就特别独树一帜。这两位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去看葛浩文的翻译，提出了很有创建的观点，他们认为葛浩文是东方主义的翻译官。东方主义是赛义德提出来，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指的是一门学科即任何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无论面对具体的对象还是研究一般的问题，这些人就是东方学家，他从事的研究就是东方主义。从意

义上来讲葛浩文翻译的是中文，自然是东方主义；第二是，东方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东方西方本体论和认识的差异上；第三是说东方主义是西方权力运作下的一种权力化，存在的目的正是为东方西方建立一个明显的分界，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这是说葛浩文在进行翻译时的目的是展示东方的落后。

这两位学者他们认为，葛浩文自己所选定的作家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莫言等为代表通过展示农民的愚昧齷齪的生活来反映中国社会和制度的不完善，作品所张扬的主要是昏庸的社会管理和愚昧的国民性。二是苏童等为代表刻画中国古代重大家庭所特有的结构模式，用以揭示中国家族之内部之间争斗，这里强调的主要是人与人的，特别是夫妻之间、妻妾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仇视残杀。两位学者就此认为葛浩文是东方主义的翻译官，因为他翻译的作品东西全都是丑化中国的。但我认为，葛浩文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是出自他对中国文学的热爱。

无独有偶，一位香港学者的博士论文里面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知识分子在编写中国当代文学选题的

时候，所青睐的作品都是暴露现实片的作品。他还说，中国境外出版的中国文选选集在翻译和选材方面几乎都表现出对争议作品和煽动性作品的偏好。翻译家和编选者都不约而同的选择翻译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作品被认为能够深度反应有问题的中国现象。压倒一切的一切的重心在于敏感小说上面，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政治取向无关，只要是揭露黑暗的现实的作品就被选过来翻译。

葛浩文本人说自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喜欢严肃的、讽刺的作品。他同时也要考虑市场和读者的偏好。他在选材方面的偏好给英语世界的读者留下一个印象，好像中国文学的确很普遍、很专注地写黑暗的，写矛盾，写人与人之间冲突。他也意识到了问题，曾经说中国文学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一个良好的现状，他要就在这一点负起责任。

中国作品进入西方文学的主流面临这的一个障碍就是，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及其有限，没有一个基本的作品库，且带有明确的主题倾向。但是中国文学本不是如此，它有着很广的范围，有很多好的作品。葛浩文说那他没有办法翻译全部，应该

有更多人投入到这项事业里。但是中国小说在美国没市场，不比在欧洲受欢迎，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美国人对亚洲的陌生和兴趣的缺乏使大陆和台湾的小说都没受到太大的重视，更不会有什么推介。

三、作为译者的葛浩文

葛浩文是一个有艺术追求的一个翻译家，他翻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有很强的艺术性，且是在国内获奖的、受到读者认可的作品。葛浩文在选择翻译作品时及其重视作品的艺术性。比如他翻译了虹影作品《饥饿的女儿》却没有翻译她的《英国情人》，因为葛浩文觉得后者的艺术品味不是很高。

“喜欢”是葛浩文选择作品的重要的一个标杆，一旦喜欢某部作品，他就倾情投入，不计得失。以前，他喜欢萧红，痴迷萧红到一个地步，因此翻译《呼兰河传》时，不惜前往呼兰河去感受。呼兰河已经成为他的精神家园，萧红也就成为他心中的缪斯。他还喜欢莫言，有人说他像和尚念经，天天嘴里都是莫言如果有一天不说莫言，他就觉得生病了，他翻译了十多部莫言的

作品。他有的时候给中国文学也提出批评的意见，他批评可以，别人批评了，他就不允许。

葛浩文说他喜欢写英文，喜欢翻译带来的挑战，喜欢翻译中遇到的不确定性。“我时常会碰到激动人心的作品，我像着了魔一样，记得要将其翻译成英文，换句话说，我译故我在。”他还说他不会为了政治翻译。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翻译家，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他不为了服务政治而翻译。如果书的翻译比其他的作品差，不具有代表性，或者是对政治有跗骨之意，那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纯纯粹粹的误解，他是不会服务于某一个政治目的的。

葛浩文是特别高产的译者，作为研究者，我觉得自己赶不上他，一份作品列表还没有做出来，又有几部作品面世了。他除了特别勤奋以外，我认为他的成功也是因为赶上了好时机——他正好开始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中国也迎来了改革开放。因此有人花钱请他翻译《渡船》、《骆驼祥子》等作品。包括《狼图腾》也是当时国内的某个文化机构委托他翻译的。葛浩文还是一个技艺高超、态度严谨、值得信赖的好译者，译者都喜欢和他合作。本来有两个译者已经把《废都》翻译好了，但贾

平凹还不放心，最终还是把版权签给了葛浩文。莫言曾经评价葛浩文说：

“我与葛浩文 1988 年开始合作，他写给我的信一百多封。打给我的电话更无法统计。我们之间如此频繁的联系，就是把我的小说尽可能完美的译成英文。我在小说中写到了不熟悉的东西，他与我反复磋商；为了一个字儿，我不得不用我拙劣的技术画画。葛浩文教授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也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能与这样的译者合作，是我的幸运。”葛浩文特别追求翻译的质量。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原作的语言，译者很难做到袖手旁观，他是忍不住的，总想让语言写得更好一点。即使做不到让一门语言精雕细琢，达到极致，也最起码也要确保译文语言的货真价实，用精当得体的语言进行表达。

葛浩文还独具读者意识，他不喜欢做注，就在文中音译加上意思解释。比如《生死疲劳》里就有对龙凤胎的翻译——“生个男孩儿叫西门金龙，女儿叫西门宝凤”。用单用拼音翻译肯定不行，所以葛浩文选择这样翻译：The birth is of a girl and a boy, which they call a dragon and a fenix birth so we named the boy Ximen Jinglong, the golden dragon and

the girl Ximin Baofeng, the precious fenix.这样的解释就是他常用的一种翻译策略。

一旦葛浩文看好谁的作品，他就利用他在汉学界的影响，就是不断地推介，使作家和作品得到人们的认可。他对莫言的推荐是这样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受到普遍的称赞，每个作品都表现出非凡的才华，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如此。他是一个写作大师。熟练掌握了各种各样的写作风格和写作形式，从预言、传说到现实主义，从露骨的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以及更多的写作风格和写作形式，莫言无所不能，他创造的形象总是令人耳目一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引人入胜，笔下的人物总是富于魅力，他别具一格的小说家。”对于他喜欢的作家和作品，葛浩文是丝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的，他曾把《红高粱》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提并论。

葛浩文还很会推销他自己。莫言获奖了以后，他立马在《卫报》(The Guardian)上写文章说莫言是他的英雄，也顺便把自己推销了一下。《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的主编采访他，要他写点关于

莫言的东西，于是他的文章开头就有了这样的话：“让我写哪个莫言？是日本的莫言，还是法国的莫言，还是瑞典的莫言，还是美国的莫言？影响很大的是美国的莫言，据说为他获得诺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事实上，他的每个词都是我的词。”他很善于推销自己，也很善于推销他的作家，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葛浩文研究中国作家作品，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经济回报，也谈不上多少文化资本的积累。有时候人们觉得翻译中国作品一定是赔本的买卖，然而他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纯粹和不功利。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德国的汉学家顾彬。后者曾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都是垃圾，很奇怪，译者为什么要浪费实践翻译劣质的作品。葛浩文说，译者做的就是翻译的工作，如果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国际轰动当然是最好的，但这不是接受一项翻译任务的前提条件。如果只是根据自己文化的标准来决定接受或拒绝一个中国文学作品，那就是傻瓜的做法。葛浩文的思想思想，我认为是很好的，他并没有用自己的美国标准去评判别人，反而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中国，还把中国的文学介绍给了美国读者。

小结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到底能不能用东方主义来概括葛浩文？给葛浩文贴上东方主义翻译官的标签，反映出学者对于葛浩文翻译的深刻的审视，引发了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新视角。但保守地说，因为葛浩文翻译了很多作品就说他是东方主义，实在相当于骂他。借用美国华裔学者顾明洞的观点，他在《汉学主义》中认为，汉学主义是一种基于无意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并渐渐地演化成为一种内在的逻辑内化，因而成就了一种无意识。选材的时候，葛浩文一直很自然选择读者会喜欢的作品，而外国读者喜欢的，正是反映中国问题的作品。因此，

不能说葛浩文的选材没有问题。但是葛浩文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更要调动更多有成就的、有能力的译者加入到译介中国作品的队伍中，把更多的中国作品推出去，以期建立读者对中国更加全面的认识。我认为这是我们接下来的努力方向。



外宣译作的读者视角分析

主讲人介绍：

陈科芳，博士、博士后、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博士；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后；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兼职研究人员；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特聘教授。现任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翻译教育研究所所长、英文学院教授。



任全国翻译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

学会翻译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等学术职务。入选“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省 151 人才工程培养人员”、“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省教坛新秀”、“校教学名师”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教育研究。在《中国翻译》、《外国语》、《外语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专著、译著和国家级教材等多部。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课题、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省新世纪教改项目、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等 20 余项。

很高兴来上外做讲座，严格意义上来说，今天其实也不是一个讲座，而是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是上外的硕士和博士。作为一个曾经在上外求学的人，作为你们的师姐，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对“外宣翻译”的理解。在讲座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打断我，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与讨论。

关于讲座题目，我不想拿之前的研究来

讲，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的内容，我想从读者视角分析来分析外宣翻译工作。就我而言，在翻译实践和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些疑惑和困惑，这些问题或许是你今后在翻译实践和研究上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试图通过自身一些探究来和大家分享，并且希望就这些问题可以和你们达成共识。

首先是选题缘由。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选题缘由：文献分析、学生论文指导、自身翻译实践。从文献分析来看，“学者言”和“学者行”是有出入的。学者们一方面倡导尽量考虑受众，用世界各国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但在实际的翻译行为中，却又不免采用“WE”甚至“I”的视角。且，关于中国文学文化外译的实证性研究严重缺乏。从学生论文指导的角度来看，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就是很 *subjective*，经常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两张皮”“自说自话”“炒冷饭”等情况。另外，结合我本人的翻译实践工作，这两年承担了某峰会的部分外宣翻译工作（包括出版一本中译英的译著、参与另外两本译著的翻译工作、负责峰会官网英语新闻的审校工作）、承担敦煌翻译的部分审校工作等，深知外宣翻译责任重大，每每都是如履薄冰，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接下来简要介绍一下本次讲座中涉及案例的文本选择、译者介绍、评者介绍。文本选择的是某峰会的其中一部译著（包括 12 篇译文），该译著已经于 2016 年 8 月出版。参与翻译的 5 位译者都是高校教师，大部分有博士学位，且有多年高校翻译教学的经验和一定的翻译实践经历。评者包括两位，其中一位是英语 *native speaker*，英语国家的翻译博士（*English-French*），另一位是英语 *near native*，是英语国家的英国文学博士。

我首先拿其中一篇译文让两位评者试评，然后结合他们提出的问题（本次暂不讨论译者的语言问题），归纳为三类翻译问题：*Habitual*

problems, *Informational problems* 和 *Comprehensible problems*。每大类问题下面，又有具体的多个小问题。采用 *descriptive* 的方法，把这些问题呈现为“描述统计量”、示意图和两位评者对不同译者的具体评判。可以明显看到有些问题是很突出的，比如两位评者都对译文的 *paragraph arrangement* 提出了很多疑议，认为有些段落太长，或安排得不够自然等；每篇译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问题，尤其是信息冗余问题，认为出现了很多 *unnecessary information*，而有些地方该明确的信息，却又不明确；译文中出现较多造成理解困难甚至无法理解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的口号性的、歌功颂德的有关表达，令外国读者无法理解和接受等。

如果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不难发现是由以下一些原因造成的：1. 翻译组织。经常存在有关部门对翻译的不了解，不尊重的情况：领导不重视、一级一级往下压、时间急、报酬低等。2. 翻译过程。译前工作做得不够到位，缺少对文本的整体解读、对读者的分析、对整体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确定，没有重视译员的选拔和把关、术语的整理和统一、整体组织协调工作等，也没有帮助译员进行相关准备工作。译中工作做得不细致，对文本的分析（作者风格）、原文文本的调整、重新编辑等工作做得不够，对翻译策略的认识不足，一概用“全译”处理，信息的查询和确认、术语和文化词语的处理都做得不够。译后环节的译者自查、同行审校工作也做得不如人意，编辑排版等工作也纯粹是从出版的角度出发，语言专家和外宣专家的力量不足。

3. 译者本身。其中一名译者的水平明显不足，虽然在评价之前，跟两位评者有言在先，本次先不评判译者的语言水平，但两位评者不约而同地指出，其中一位译者的语言功底，尚不能担任这样的一项任务。其他译者也多多少少存在各种不足。虽然说承担本次翻译任务的5位译者都是高校教师，有博士硕士学位和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经验，但其对外翻译的英文水平，恐怕还是要大力加强。

针对以上问题，我有一些思考：1. 翻译阶段。翻译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尊重译介的阶段，深度翻译、厚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并不一定行得通，或受欢迎。目前来说，有些内容或有些话题不妨基于读者本位，采用浅度翻译、易化原则，一口吃不成个胖子。2. 读者分析。勒弗菲尔（2001:94）曾说：翻译总是在重铸其所

在文化的诗学，使其取悦新的听众，从而保证译文能够真正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阅读。“取悦”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但至少要让读者愿意阅读，能够理解和试着接受。试问，有多少观众、读者是学者型的？尤其是要考虑到现代社会的阅读习惯，强调电子化、短平快。谢天振（2017）从传教士翻译得出启示，“不以我为中心”，或许更好地能帮助解决当前文化外译的某些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区分严格意义的翻译和宽泛意义的翻译，开展读者文化心态和读者分类研究，进行国外接受的实证性调查研究，实行国内出版社与海外出版社的联姻，加强中外译者的合作等。

以上只是我本人结合翻译实践的一点粗浅心得。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样本不够多、两位评判者的标准把握精准度问题等，需要进一步改进。最后，非常感谢大家来聆听和交流！

新疆双语教育模式的 理性选择与过渡

——一项基于语言景观的实证研究

杨金龙 梅德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 200083)

摘要 通过采集乌鲁木齐市、库尔勒市和喀什地区的语言景观发现,随着维、汉语言接触程度的下降,三地双语标牌中汉语的凸显性和信息性逐渐减弱,维吾尔族居民的汉语使用率、汉语识字能力呈递减趋势。在汉语使用率低、学生汉语水平参差不齐的南疆部分地区,中小学若急于转向汉语授课比重更大的新型双语教育模式,很难从根本上保证教学效果。当地教育部门可从教育模式、评价体系、语言使用环境三方面进行改善,以提升双语教学质量。

关键词 新疆; 双语教育; 语言景观

中图分类号 H1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397(2016)04-0035-07

The Rational Choice and Transi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Model of Xinjiang: An Empirical Study on Linguistic Landscape

YANG Jinlong, MEI Demi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of Xinjiang in an effort to provide a reliable educational assessment for relevant authoritie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collected respectively in Urumqi, Korla and Kashgar,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reduced contact of Chinese and Uighur, the salience and informativeness of Chinese on billboards tend to decline, and the Uighur residents tend to use Chinese less and a lower literacy of Chinese is found. This article further argues that in parts of Southern Xinjiang where Chinese is used less and learned unsatisfactorily among

收稿日期 2016-05-09

作者简介 杨金龙,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梅德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生成句法学、教育语言学、语言哲学。

students, a hastened transformation into a new bilingual model with a strong emphasis on Chinese will fail to fulfill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 suggestion is thus made that relevant authorities should improve bilingual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language teaching pattern, language assessment system and language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Keywords: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Bilingual education; linguistic landscape

DOI:10.16499/j.cnki.1003-5397.2016.04.00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典型的多民族、多语言地区之一,其中包括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等 47 个民族,使用的语言包括突厥语族、汉语族、蒙古语族、满一通古斯语族等六大语族(张梅,2009)。面对当地多民族、多语言的现实问题,我国政府自上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探索双语教育模式,其目的是培养“民汉兼通”的人才(方晓华,2011)。当前,按照汉语授课比重的不同,新疆双语教育模式一般分为以下四种:(1) 母语授课为主,加授汉语。在该传统模式下,学生的汉语和理科学习成绩很不理想,升学、就业率低。采用此模式授课的学校已出现生源逐渐减少的趋势。(2) 理科课程汉语授课,其他课程母语授课。该模式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学生的理科学习效果,同时借助汉语授课比重的增大来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3) 涉及民族传统文化的课程母语授课,其他课程汉语授课。该模式提倡音体美等传统文化课程采用母语授课,发扬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其他课程则采用汉语教授。(4) 全部课程汉语授课,加授民族语文课程。该模式是自治区实行双语教育的最理想模式,但对教师、学生的双语水平要求较高,一般仅在交通条件较好、师资力量较雄厚的民汉合校中采用。

一 问题的提出

长久以来,南疆部分民族学校的教学质量始终不理想,学生的汉语和理科学习效果极差,严重阻碍了学生的升学、就业率。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家长将原因归结为传统双语教育模式中汉语的摄入量太少,迫切希望孩子能尽早学习汉语,以改善孩子的理科和汉语学习成绩。这导致“母语授课为主、加授汉语”的传统双语学校生源日渐减少,而“汉语授课为主、加授母语”的双语实验学校由于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甚至在喀什地区出现“部分汉语幼儿园招收了 70% 维族儿童”的情况(马戎,2008)。部分中小学为了满足家长需求、改善学校生源,也急于向汉语授课为主的新型双语教育模式转变,对教师、学生的汉语水平过于乐观。据马戎(2008)调查,许多少数民族教师为了达到自治区的汉语水平的要求,甚至频繁通过各种违规渠道获取汉语水平考试(HSK)证书。

影响双语教学效果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双语教育模式本身,而在于支撑双语教育模式的内在和外在条件是否充分具备。比如,是否具有精通或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双语教师,学生是否有强烈的学习双语的动机,是否具备丰富的学习资源和良好的双语学习环境等(万明钢、刘海建,2012)。新疆的少数民族在人口分布上大多呈聚居状态,由于地理、交通等因素的限制,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使用环境差异较大,少数民族的汉语能力发展极其不平衡。因此,影响双语教育效果的内外在因素差异较大。对于汉语使用环境较局限、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较低的地区,学校若仅以满足当地居民的汉语学习需求为目的,过分依赖教师的汉语等级考核制度,急于向汉语授课为主的新型双语教育模式转变,未必能从根本上缓解生源问题、保证教学

质量。因此,考察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语使用环境和居民的汉语识别能力,是教育部门合理选取授课模式的重要评估依据之一。

二 语言景观研究综述

我们认为,近年来社会语言学界的语言景观研究视角适用于探究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语真实使用环境。

语言景观最早由 Landry 和 Bourhis(1997) 提出,认为“公共设施如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上的语言共同构成一个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语言景观一般具有两大功能,即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前者是指语言景观能够提供信息,使读者了解某个语言群体的地理边界和构成以及该社区内的语言使用特点;后者是指语言景观能够映射该言语社区内的语言权势与社会身份和地位。由于语言景观研究视角新颖,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社区内的语言使用情况,该方法已成为国外多个学科领域的热点课题。如 Gorter(2006)、Spolsky(2009)等,分别将语言景观运用于多语现象、城市语言生态等多个研究领域。相比之下,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多以介绍、述评语言景观理论与方法为主(尚国文、赵守辉,2014;李丽生,2015),部分学者虽然观照到语言景观的实证研究,但关注的焦点多为双语标牌的翻译规范问题(杨永林,2010)以及个别城市的中外双语/多语标牌研究(如俞玮奇等,2016;张媛媛、张斌华,2016),对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多语地区的语言景观及其背后的象征功能挖掘不够深入,研究纬度不够广泛。

本研究试图借鉴国际视角,通过分析新疆乌鲁木齐、库尔勒、喀什地区的语言景观,探究三地的汉语使用环境,为当地教育部门合理选取双语教育模式提供更可靠的评估体系。

三 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通过采集新疆乌鲁木齐、库尔勒和喀什地区的语言景观,旨在探究以下三个问题:

1. 新疆三地的语言景观有何差异?
2. 三地语言景观的差异与汉语使用环境有何联系?
3. 不同语言景观所体现出的汉语使用环境差异对当地双语教育有何启示?

(二) 研究对象

新疆少数民族类别较多,涉及的语言接触、多语现象十分复杂,其中维吾尔族的人口比重最大,约占自治区总人口的46%。为明确研究对象,仅选取维汉双语标牌为研究资料,并借助双语标牌调查三地居民的汉语识字水平及其对汉语的态度。

(三) 资料采集地点

本研究的资料采集对象为维汉双语标牌,访谈对象为维吾尔族居民。采集资料的选址以维吾尔族聚居区为主。根据维吾尔语与汉语的接触程度,选择以下三个城市进行资料采集:(1)乌鲁木齐市:省会乌鲁木齐是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等教育条件相对较好,维汉人口杂居程度较高。(2)库尔勒市:库尔勒是南疆的主要交通枢纽,其经济、文化水平在南疆范围内相对较高;该市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人口分布以蒙古族、汉族、维吾尔族为主,维吾尔族人口比例低于南疆其他地区。(3)喀什市:喀什是南疆主要城市之一,维吾尔族人口约占全市人口的90%。该地区是典型的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区,

汉族人口相对较少。

(四) 资料采集方法

为方便研究,笔者与两名当地学者(其中一名汉族学者、一名懂维汉双语的维吾尔族学者)共同参与资料的采集与调查。调研过程中利用数码相机拍摄三地的维汉双语标牌影像,其中分为两大类:(1)官方的和公共的;(2)私有的和商业的(尚国文、赵守辉,2014)。

此外,为调查三地居民的汉语识字水平,本研究采用拉波夫(W. Labov)经典的“快速匿名调查法”获取数据。该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在当地居民未觉察到被调查的前提下、在相对自然的语境中,较真实地了解居民的汉语识字情况。调查过程中,研究组的维吾尔族学者随机选取经过双语标牌的维吾尔族居民进行询问“请问标牌上的汉语是什么意思?”若被试能立即且准确回答,则认为其懂得汉语;若被试出现犹豫,则追问“请问你认识标牌上的汉语吗”以确定答案。研究组其他成员隐匿在附近,记录调查结果,随后对结果进行量化统计。

(五) 研究过程

资料采集时间为2015年8月,其中乌鲁木齐市的资料采集共持续5天,采集地点为该市天山区解放南路及其周边。该区域为乌鲁木齐市的维吾尔族聚居区之一,包括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等维吾尔族传统贸易市场,因此,此路段的语言景观资料相对更丰富、访谈对象更具代表性。调研过程中利用数码相机拍摄,共获得影像资料348张,其中公共双语标牌23张、商业双语标牌325张。通过快速匿名调查法共调查当地居民50人。

库尔勒市的资料采集共持续2天,采集地点为该市团结路及其周边。该区域为库尔勒市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区之一,且商业较发达,便于进行资料采集。调研过程中共获得影像资料176张,其中公共双语标牌22张、商业双语标牌154张。通过快速匿名调查法共调查当地居民38人。

喀什市的资料采集共持续5天,采集地点为喀什市解放北路、吾斯塘博依路、人民东路及其周边街区。上述区域为喀什市维吾尔族的主要商业、农贸市场,商铺较多,人口流动较大,语言景观更具代表性。调研中共获取影像资料387张,其中公共双语标牌55张、商业双语标牌332张。通过快速匿名调查法共调查当地居民57人。

四 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在乌鲁木齐市、库尔勒市和喀什市共采集维汉双语标牌影像911张,分为官方标牌和商业标牌两部分,详细数据见表1。为借助语言景观调查居民的汉语识字情况及其对汉语的态度,辅以快速匿名调查法、访谈法,三地调查共计145人、访谈9人。通过收集和整理影像资料、统计调查结果、转写访谈语料,研究者在以下三个纬度进行分析:

表1 维汉双语标牌影像采集情况明细

采集地点	总数	官方标牌	商业标牌
乌鲁木齐	348	23	325
库尔勒市	176	22	154
喀什市	387	55	332

(一) 三地语言景观的凸显性分析

双语标牌中,语种的凸显程度与该语言的使用环境和地位密切相关(尚国文、赵守辉,2014)。从凸显程度来讲,三地的官方标牌几乎保持一致,即汉语处于双语标牌的主要位置,或在字号上明显大于维吾尔语。由此可见,在官方层面上,不论是省会乌鲁木齐市还是维吾尔

族相对聚居的南疆地区,汉语的权势和地位均比维吾尔语高。这可能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语言政策相关:汉语为我国的官方语言,而维吾尔语仅为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之一,因此汉语理应放置在双语标牌中更凸显的位置。

相比之下,三地的商业双语标牌中,汉语的凸显性呈递减趋势(见表2)。乌鲁木齐市325张商业标牌影像资料中,96.7%的标牌汉语凸显性高于维吾尔语(如图1),仅0.9%的标牌维吾尔语凸显程度高于汉语,其余影像资料中汉语与维吾尔语凸显程度相当,很难界定孰高孰低。库尔勒市的154张影像资料中,62.3%的标牌汉语凸显程度高于维吾尔语,而24%的标牌维吾尔语凸显程度高于汉语。喀什市的332张商业双语标牌影像中,仅23.8%的标牌汉语凸显程度明显高于维吾尔语,但多达70.8%的标牌维吾尔语凸显程度高于汉语,其余则很难界定孰高孰低。

表2 三地影像资料的双语凸显程度统计

采集地点	商业标牌总数	汉语凸显程度高	维吾尔语凸显程度高	难以界定
乌鲁木齐市	325	314(96.7%)	3(0.9%)	8(2.5%)
库尔勒市	154	96(62.3%)	37(24%)	21(13.6%)
喀什市	332	79(23.8%)	235(70.8%)	18(5.4%)

此外,喀什市的汉族人口数量较少,维吾尔族居民几乎很少有机会与汉族人交流。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居民极少使用汉语,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一般都使用维吾尔语进行交流,甚至当地的街头广告、海报、传单等仅使用维吾尔语(如图2)进行印刷。由此可见,喀什市的维吾尔族居民汉语使用率极低。



图1 乌鲁木齐市商业双语标牌



图2 喀什市街头广告

(二) 三地居民的汉语识字情况分析

本研究运用快速匿名调查法对居民的汉语识字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结果如表3。乌鲁木齐市的调查结果显示,94%的居民表示认识标牌中的汉语,仅3名中老年女性居民表示只认识维语,不认识汉语;76.3%的库尔勒市维吾尔族居民表示能够看懂标牌上的汉语;但喀什市的调查显示,仅43.9%的居民表示自己认识汉语。

表3 三地居民的汉语识字情况统计

调查地点	调查总人数	认识标牌上的汉语	不认识标牌上的汉语
乌鲁木齐市	50	47(94%)	3(6%)
库尔勒市	38	29(76.3%)	9(23.7%)
喀什市	57	25(43.9%)	32(56.1%)

(三) 三地居民对汉语的态度分析

为了解三地的维吾尔族居民对汉语的态度如何, 研究组采取滚雪球式抽样方法, 在乌鲁木齐、库尔勒和喀什分别选取三名维吾尔族居民进行访谈。当被问及“汉语重要还是维吾尔语重要”“希望学校用汉语教学还是维吾尔语教学”时, 大部分被访者表示“在中国就要学好汉语, 汉语比维吾尔语更重要。”“希望学校用汉语教学, 让孩子们学好汉语, 以后找工作、考大学更容易。”由此可见, 三地居民对汉语都持积极态度, 希望学校使用汉语教学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升学率等工具性动机。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采集新疆乌鲁木齐市、库尔勒市和喀什市的语言景观资料, 并借助语言景观对三地居民进行调查和访谈, 旨在探究三地的汉语使用情况。

三地的官方双语标牌中, 汉语的凸显性无明显变化, 但商业标牌中的汉语凸显性则明显下降。三个资料采集地区中, 省会乌鲁木齐市人口密度最大, 维汉居民的接触与往来相对频繁; 作为南疆的主要交通枢纽, 库尔勒市是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 该市居民除汉族与维吾尔族外, 还有较大比例的蒙古族世居此地, 当地维吾尔族人口多居于团结路及其周边, 与汉族人口接触较少; 喀什市是南疆维吾尔族的主要聚居地区, 绝大多数居民为维吾尔族, 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极低, 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很少在生活中接触汉族、使用汉语。因此可以认为, 三地的维汉语言接触程度呈下降态势。多语地区的双语标牌中, 官方标牌一般更能体现语言的权势和地位, 即象征功能, 而商业标牌更能体现出该言语社会区的语言使用情况, 即信息功能。随着维汉语言接触程度的下降, 双语标牌中汉语的凸显性和信息性逐渐减弱, 而象征性未呈现明显变化。由此可见, 在维汉语言接触程度较低的南疆部分地区, 双语标牌中所使用的汉语多体现在其象征功能, 当地维吾尔族居民很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使用汉语。

三地维吾尔族居民的汉语识字能力呈递减趋势, 尤其是喀什地区的居民汉语使用率极低。但不论是乌鲁木齐、库尔勒还是喀什, 居民对汉语均持积极态度, 绝大多数居民倾向于当地学校加强汉语授课比例。究其原因, 大部分居民迫切希望学校加强汉语授课比重的目的是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升学率等工具性动机。

汉语是维吾尔族的第二语言, 有关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期问题, 国内外二语习得领域始终没有统一答案。虽然部分学者认为, 儿童的第二语言习得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 二语习得的最佳时期为两岁至青春期, 即所谓的“关键期”, 但也有学者认为, 在儿童完全不懂第二语言的前提下, 过早将其暴露在第二语言的学习环境中、运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 学习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有学者(May & Hill, 2003; Mohanty, 1994、2008 等)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过早地运用第二语言进行课堂教学, 学生的各科成绩和第二语言学习效果远不及母语课堂教学, 以致学生因跟不上教学进度、不能完成学习任务而辍学。由此可见, 在汉语使用率低、汉语识字能力欠缺的前提下, 南疆地区的维吾尔族居民以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升学率和就业率等工具性动机为目的, 急于将孩子送至“汉语授课为主、加授母语”的双语实验学校, 未必能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 实现提高升学率和就业率的愿望。对教育部门来讲, 开展“汉语授课为主、加授母语”的双语教育新模式, 对内需要具备一定的双语教学能力的教师、一定汉语基础的学生, 对外需要一定的汉语使用环境。而南疆部分中小学若在当地汉语使用率低、学生汉语识字能力欠缺的现实情况下, 急于向汉语授课为主的新模式转变, 很难真正保证教学质量, 甚至

会造成学生学习效果差、不能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辍学率上升等不良后果。

基于目前新疆(尤其是南疆部分地区)汉语使用率低、学生汉语能力参差不齐的现实情况,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首先,当地教育部门可参考新加坡式分流教育,实行双语教育与分流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即学校可在学生入校前采取一定的学能测试,根据生源的双语掌握程度、学习态度、学习能力等实行分层、分流教学,在学校内部安排不同的教学模式,使用不同的教学语言和教学方法,促进双语教育模式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进一步发展。其次,鉴于新疆目前仍没有较完善的双语课程标准和评价体系,相关部门应以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沟通能力等核心素养为目标,促进形成性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发展,而不应仅仅视中考、高考等终结性评价为唯一标准。最后,南疆部分地区可通过汉语书籍、多媒体等方式,有意识地从校内、校外两个方面增加学生的汉语输入量,设计更科学的双语学习环境,进一步强化当地的汉语学习气氛。总之,在全疆范围内推进汉语授课为主的新模式仍任重道远,南疆部分中小学应充分考虑当地的现实情况,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理性向新型双语教育模式过渡,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生源、提升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 [1] 方晓华. 新疆双语教育问题探索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 [2] 李丽生. 国外语言景观研究述评及其启示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 (4).
- [3] 马戎. 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8, (6).
- [4] 尚国文, 赵守辉. 语言景观的分析纬度与理论构建 [J]. 外国语, 2014, (11).
- [5] 尚国文, 赵守辉. 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 (2).
- [6] 万明钢, 刘海建. 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从政策法规体系建构到教育教学模式变革 [J]. 教育研究, 2012, (8).
-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新疆民族语言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2.
- [8] 杨永林, 李晋. 双语标识译写研究——街名标识篇 [J]. 外国语言文学, 2010, (4).
- [9] 杨永林, 刘寅齐. 双语标识译写研究——理论方法篇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0, (3).
- [10] 俞玮奇, 王婷婷, 孙亚楠. 国际化大都市外侨聚居区的多语景观实态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6, (2).
- [11] 张梅.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及其语言使用问题 [J]. 民族教育研究, 2009, (4).
- [12] 张媛媛, 张斌华. 语言景观中的澳门多语状况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6, (2).
- [13] Gorter, D. *Linguistic Landscape: A New Approach to Multilingualism*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6.
- [14] Landry, R. & R. Y. Bourhis.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16).
- [15] May, S. & Hill, R. *Bilingual/Immersion Education: Indicators of good Practice* [M]. Hamilton: Wilf Malcolm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Waikato, 2003.
- [16] Mohanty, Ajit K. *Bilingualism in Multilingual Society. Psycho-social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M]. Mysor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 1994.
- [17] Mohanty, Ajit K.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 India* [M]. New York: Springer, 2008.
- [18] Spolsky, B. *Prolegomena to a Sociolinguistic Theory of Public Signage* [A]. In E. Shohamy & D. Gorter (eds.), 2009.
- [19] Skutnabb-Kangas, T.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Volume 5 Bilingual Education* [M], New York: Springer, 2008.

多元系统中翻译“分子化运动”与多元系统“临界态”研究初探

杜磊 肖维青 上海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以多元系统论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出现的译者主体性与多元系统论之间的矛盾为切入点,提出翻译“分子化运动”假设。翻译“分子化运动”具备观照译者主体的“微观性”与多元系统的“动态性”,是推动系统进入“临界态”,并促使其产生“位移”的内在主导因素;作者认为,翻译“分子化运动”使研究者得以有效观察到多元系统背景下的译者主体,并深入研究译者活动与多元系统内外变化之间的关系,因而能有效提高多元系统论的理论解释力;同时,翻译“分子化运动”也是翻译文学史推进的“动力”,可能成为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新工具。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翻译“分子化运动”;微观性;动态性;临界态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 (2017) 01-0018-07

1. 引言

系统理论是多元系统论 (Polysystem Theory) 的理论雏形,在历史上早已广泛存在于科学研究领域。俄国语言学家 Tynyanov 试图打破形式主义的桎梏,首先将系统理论用于对文学进化规律 (literary evolution) 做历时性阐释。他的文学系统“位移”理论,“促使着批评家和理论家始终动态地、发展地看待文学理论和概念”(张冰, 2008: 4)。在此基础上,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 (Even-Zohar) 最早将这种系统思想应用于文化研究。通过建立多元系统论,佐哈尔历时地分析了具体的文学与翻译现象,极大地丰富与拓展了翻译文学研究的视野。由于他的贡献,翻译文学研究整体打破了以往以源语与译入语功能对等为中心、二元封闭式的分析范式。自此,翻译文学研究的天空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扩展,本来狭小的文本空间被扩大到了一个可以容纳决定翻译文学产生的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广阔空间。在多元系统论的观照下,研究者可以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把翻译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进行细致描写,将原本停留在共时平面“一点”上裹步不前的翻译研究延伸开来,扩大到时间轴上历时的“一片”,从而使翻译文学研究在时空维度上获得了很大的突破。然而,将多元系统论用于翻译历时研究依旧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本文试图将翻译“分子化运动”这一新概念整合入多元系统论,以解决多元系统论的“运动问题”,从而达到推动多元系统论向前发展的目的。

2. 研究综述

2.1 中外对多元系统论的批评

从翻译研究方法论上来看,多元系统论把翻译活动纳入到了历史与社会的观察维度上,使得很多原本在译文语言对比分析的研究模式下无法解答的问题获得了较为充分、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多元系统论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翻译文学生产活动的“肇发现场”,“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谢天振, 2003: 66)。基于多元系统论的翻译研究也代表了一种翻译研究思考方向上的本质变化。肖维青 (2010: 266) 就指出,从翻译批评的角度来看,多元系统论不同于基于文本分析的翻译批评模式,是一种基于外部因素,由文本外向文本内看的研究模式; Gentzler (2004: 108) 认为,以前的学者倾向于观察一对一的 (one-to-one)、功能概念式 (functional notion) 的对等关系,并认定个人取得对等文本的主观能力 (subjective ability) 影响着特定社会中的文学与文化传统,而多元系统论者的假设则完全相反。后者认为,译入语文化中的社会规约 (social norms) 和文学传统 (literary conventions) 支配了译者的审美预设 (aesthetic presuppositions), 因而影响了译者后续的翻译决策。

然而,无可否认,很多西方学者在肯定佐哈尔对翻译研究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多元系统论存在的局限与缺陷。在本体上,

Gentzler (2004: 120) 指出, 佐哈尔自己就承认, 多元系统论提出的共性 (universals) 有基于证据过少的倾向, 且数据中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现象, 表露了其很多假设具有一种只为一时之用的性质 (ephemeral nature), 扭曲了其理论价值; 在具体应用层面, Bassnett & Lefevere (2001: 127-128) 充分认定多元系统论能促使研究者积极反思编撰文学史的方法, 对如何发掘那些塑造过去与当下的力量 (map out the shaping force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这一问题进行反思, 但同时又批评佐哈尔提出的重大翻译活动 (major translation activity) 发生的三个条件失之粗糙 (somewhat crude), 其中涉及的评价性术语, 如“外围” (peripheral)、“中心” (central)、“强大” (strong)、“弱小” (weak)、“少数族裔/多数族裔” (minority/majority) 等二元概念界定模糊, 给应用研究带来各种困难; Hermans (1999: 118-119) 指出, 以这种(多元系统论)为性质的研究, 过于抽象 (abstract) 与超然物外 (depersonalized), 有决定论 (deterministic) 之虞。就使用相互排斥的术语进行研究操作的这个意义上来看, 他的批评与 Bassnett & Lefevere 相似, 强调多元系统论对所有那些模棱两可 (ambivalent)、混杂 (hybrid)、不稳定 (unstable)、流动 (mobile)、交叉 (overlapping) 与崩溃 (collapsed) 的元素依旧视而不见。

2.2 多元系统论的中国本土化困境：多元系统论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矛盾

理论会发生传播效应, 多元系统论同样也会经历赛义德 (Edward Said) 所谓的“理论旅行”^①。自 90 年代以来, 多元系统论以其理论与应用上的优势迅速跨越国界, 被世界上很多翻译研究者作为描述性翻译研究的一大工具。毫无疑问, 自 21 世纪从西方传入中国以来^②, 多元系统论正在经历中国本土化发展。一方面, 多元系统论正在逐渐被“内化”, 即被中国学者借用于研究中国翻译问题 (杨柳, 2008)。另一方面, “理论旅行”途中, 多元系统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形变。学界对发生在本国的理论误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与反思, 如邵璐 (2004)、张南峰 (2008)。

与此同时, 随着本土化进程的推进, 一些学者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在中国现实语境下接受、

应用理论时所遇到的矛盾与困难。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庄柔玉 (2000)、谢世坚 (2002)、于德英 (2004)、彭勇穗 (2012)。综合来看, 这些批评研究的共同焦点在于多元系统论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矛盾。其中, 谢世坚 (2002) 与庄柔玉 (2000) 从多元系统论的自律性与中国翻译史上特殊案例之间的差异寻找突破口, 阐发不受多元系统论支配的翻译现象背后的译者主体性因素; 于德英 (2004) 与彭勇穗 (2012) 则代表了一类从本体角度切入的批评研究, 前者从多元系统论结构主义思想的“母体”——俄国形式主义的缺陷出发探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形态缺陷, 认为多元系统论因强调超然客观运作而导致译者主体性缺场。后者从多元系统理论的基础——索绪尔语言学与形式主义为契入点揭示多元系统论的两大“先天”缺陷, 强调系统是主体的主观建构。在这些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之下, 学界对多元系统论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到底受到什么样的条件限制这一问题的答案逐渐清晰, 多元系统论中国本土化进程所受阻力的本质——译者主体性也逐渐显现。

近年来, 国内一些一方面从事多元系统论研究, 另一方面从事中国翻译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也开始注意到了多元系统论在解释我国翻译文学史过程中与译者主体性之间发生矛盾的现象, 视角呈现微观化, 如查明建 (2015: 129) 认为: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 现代主义文学处于中国翻译文学系统边缘的位置, 但是,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译文层面) 并没有完全采取“可接受性”策略, 而主要采取了“充分性”策略。之所以采取“充分性”翻译策略, 是译介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真正目的——输入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方式。

任何理论都有其应用的边界与条件。多元系统论对一国翻译文学史的推论与预测在很多情况下是符合实际的, 然而, 其理论形态高度抽象、客观化的特点又使得依据它所做出的结论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以上就是典型一例。若以当时亲身参与译介的翻译家代表李文俊先生对自己翻译策略的阐述来进一步观察, 则足以佐证以上所言不虚。在一次回忆自己翻译福克纳作品《押沙龙, 押沙龙!》(Absalom, Absalom!) 的访谈中他提出^③:

翻译时难就难在必须要把作者蓄意表达的一切因素全部准确地表达出来,文字尽可能熨帖老练,符合中文习惯用法,还要保留住作者的“神来之笔”。

李文俊先生的这段话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时翻译家在翻译欧美意识流作品策略上的共性。“一切因素全部准确地表达出来”与“神来之笔”表明译者尊重源语语篇关系,在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上压倒性地采取了充分性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策略,即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把原文中以意识流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元素进行充分还原,以求完全彻底地“输入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方式”(查明建,2015:129)。这种还原陌生化语言形式的策略是否达到了译者的目的?读者在当时的反应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福克纳用长句表现意识流的形式被译文保留,造成很大的阅读冲击,读者反应强烈,有的甚至向上海译文出版社提出质疑——“为何译作里不加标点?”^④

此例有代表性的特殊翻译现象与两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一、与七八十年代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以“可接受性”为系统主流策略的背景相矛盾;二、与多元系统论的推论相矛盾。我们知道,意识流小说在当时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彼有我无”、异质性很强的文学形式,处于中国翻译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按多元系统论的观点,译介这样的作品要获得读者接受,一开始只能套用本国文学中现存的“二级模式”,而译者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逆势而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翻译决策显然是译者主体性发挥了很大作用的结果(彭勇穗,2002:114)。

在中国翻译史上,除了译介现代主义文学的七八十年代这一案例以外,多元系统论的推论与实际发生偏离的现象还发生在“五四”时期。按佐哈尔所言,“选取作品来翻译的原则是取决于(本国)多元系统的状况的:除了看作品跟新的手法是否协调外,还要看它们在译语文学中能否扮演所谓革新的角色”^⑤(Even-Zohar,2001:193)。因此,“五四”时期拟译作品的标准应当是那些有着时代与进步意义,对旧的、保守的思想与文化能形成挑战,能重塑新的中国文学系统的作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建开(2003:50)就认为,虽然“那种只为取悦读者或单纯为满足个人审美情感的译介实践受到挑

战及遏制”,但“事实上,按个人偏爱的艺术倾向进行译介者仍不乏其人,喜好浪漫主义反叛精神的创造社和新月社圈内人士便是典型……均因作者与译者之间在性情或观念上的契合有关,并且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上:39-40);蒙兴灿(2009:173)从“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的现实角度也说明了这种矛盾:“拟译文本的选择不仅仅是由对多元系统起支配作用的情况决定的,译者的主体性也对文本的选择起直接作用。”可见,译者主体性与多元系统论的对抗不仅发生在始发规范层面,决定拟译文本选择的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也一样可不受多元系统论的支配。由于译者有着不同的个人感受与偏好,个体的知识结构迥异,运用超然的多元系统论很难解释译者的这些背离时代主题,甚至摆脱意识形态系统钳制的翻译行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翻译活动在系统中所取得的成就也可谓大矣,创造社与新月社即是“五四”翻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上所述,多元系统论的中国本土化困境在于多元系统论与译者主体性之间发生了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多元系统论对这些翻译史上产生重大意义的微观现象“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自然也无法对这些进入“盲区”的译者活动提供合理解释,这是多元系统自律性的局限。从表征上来看,这些与多元系统论发生矛盾的译者行为与翻译活动具有明显违背多元系统论超然客观性的特点,它们多集中在个别译者或译者群上——其“规模”小,但在翻译史上发出的“能量”大,这些活动所折射出的译者主体性并没有因多元系统论的宏观性而遭到遮蔽,反而在系统中得到了比较彻底的彰显,与系统之间形成很强的张力。

3. 翻译“分子化运动”假设:微观性与动态性的统一

我们认为,译者主体性的充分表达使其摆脱了多元系统论的操控与预设,成为了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分子”。在放弃“可接受性”的同时,这些“分子”从创造的角度打破本国固有范式,直接参与经典化形式库(canonical repertoire)中规则与材料的建构。但是,这种革新的译者行为并不静止于“分子”自身,看待

这类现象也不应止步于译者主体性。我们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与多元系统论对抗的译者“分子”可能与多元系统发生的运动有很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它很可能在其所在的翻译文学系统内部施加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方向的力,造成了类似于 Tynyanov 所阐发的文学理论“位移”现象(张冰,2008:4),从而帮助系统向中心位置移动或者占据中心位置,挑战经典化形式库,成为能产的(productive)经典。这种“力的作用”十分关键,因为它可以初步回答“系统为什么会运动”以及“系统运动的动力从何而来”这两个系统运动问题。因此,这些译者“分子”理应成为多元系统下研究翻译文学与文学史的焦点。

基于其有悖于多元系统论的微观本质与独立个体的特点,我们首先把这一现象命名为翻译“分子化运动”。并假定是这些特殊的译者“分子”为系统提供了向中心运动的“力”。同时,我们把这一新概念定义为“造成系统发生状态性变化的译者主体性活动”,并尝试进一步阐发翻译“分子化运动”的两大特征:微观性与动态性,从这两个角度论证它作为一种翻译理论假设的合理性,从而将它整合入多元系统论。

3.1 基于翻译活动微观性的翻译“分子化运动”

多元系统理论中的“多元”视角虽然重视差异性,但微观性明显不足。众所周知,佐哈尔是在批评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多元系统论的。他研究文学在历史上的嬗变,试图把文学的历时研究纳入到语言研究领域。其“系统”的思想得益于科学研究的系统论思想。“系统”把同质的元素纳入到一个观察范围中,使研究这些元素的共性,理解它们整体变化规律成为可能。“多元”的思想则观照了系统彼此的差异性——不同的元素由于存在差异又被纳入了不同的“系统”中,构成了很多系统同时参与运动的“多元系统”。借助多元系统论宏观多样的视角可以考察翻译现象与社会多元结构之间的历史联系,还原翻译发生的语境或发掘出影响翻译产品生产的某个前人可能忽略但却有重大意义的因素。但是,这样构成的多元系统毕竟带有很强的宏观性。

译者主体性意味着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合法享有一定的自由,如果用一个宏观的框架去诠释一个微观的翻译“分子化”现象显然是很难做到的。这就提醒我们,假如要在多元系统的宏观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全面地观察翻译现象,还需要增加一个微观视角作为两者的中介,这就是我们提出翻译“分子化运动”这一假设的理论依据与出发点。

3.2 基于多元系统动态性的翻译“分子化运动”

多元系统论假设认为,系统是由代表经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符号等次级系统构成的一个开放的大系统,“次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争夺系统中的主导。系统的运动是多元系统动态性的最主要体现。张南峰、庄柔玉认为(2001:7)“多元系统并不是静态、固定不变的。地位不同的系统,永远在无休止地斗争;而在某些内在或外来因素的影响之下,边缘系统有时会取得胜利,进占中心位置,更可能把中心系统排挤到边缘”。各种次级系统之所以会相互角力斗争,原因在于它们之间地位并不平等,占据次级、边缘地位的系统总会试图进入中心,获得主导地位。

因此,多元系统论中运动是常态的、绝对的,平衡、静止则是暂时的、相对的。在某个时期内,翻译文学作品作为一个系统,通过生产与消费与各种社会因素组成的其他系统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但随着时间推移,原本建立好的关系并不会一成不变,多元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次级系统只要稍微产生一定的“位移”,已经建立好的平衡关系就会受到扰动,其他次级系统就会随之产生或大或小的“位移”。系统位置的变化导致原本稳定的关系网就此打破,新的系统间关系得以生成,一个系统内新的平衡态就产生了,直到运动重新开始为止。因此,系统的这种以“位移”为特征的动态特性是理解多元系统论的关键所在,将多元系统论假设运用于翻译文学研究时应该对这种动态特性加以高度重视。

然而,多元系统动态性虽然已经被学界所理解,但只集中在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上,还很不全面,对于多元系统动态性的深入研究还存在着明显不足。其中,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系统

为什么会运动?系统发生“位移”变化的“动力”从何而来?这是目前多元系统理论研究不应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依据多元系统论对翻译文学的研究还只停留在对于某一特定时期影响翻译文学生产的一些因素的记录性描写,我们只是粗浅地了解翻译文学系统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会出现变化这一事实,往往在被动地接受了变化的结果之后就简单地认定多元系统有运动的特性。这样固然符合描写翻译研究的趋势,但不够精细深入,学界尚没有看到促使翻译文学系统运动的根本动因可能存在于系统内部,而非外部。事物发展的内因大于外因,通过系统运动变化的结果描写外界影响系统运动的因素固然重要,但系统自身内部因素才是促发系统发生位移的根本原因,是研究的应有之义与重中之重。现有的对影响翻译文学系统的外界因素进行描写的研究范式虽然突破了以往研究“对等”的传统范式,但还不能真正地观照翻译文学发展与进化的动态层面。

我们认为,微观的翻译“分子化”运动则恰恰就是系统“运动”的“发起者”。这类译者主体的微观活动往往与多元系统论的预测与解释存在矛盾冲突,却可能是翻译文学系统一个时期内引领新的翻译思想、策略的开创性活动。学界应该转向对这类翻译“分子化”运动研究,并深入发掘这类特殊运动与系统发生演变之间的深层关系。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认为翻译“分子化”运动的提出有其理论必要性,一方面它对译者主体在系统中活动的微观本质进行了高度概括,满足了翻译研究对活动进行观察的微观性要求;另一方面,它所具有的动态性是译者主体与多元系统之间联系的“桥梁”——它真正体现了多元系统的动态属性,初步回答了多元系统长期悬而未决的“动因”问题,对多元系统论在理论上的不完备进行了补充。

4. 作为“分子化运动”的鲁迅翻译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系统的“临界态”

在3.1与3.2中,我们从理论的角度详细论述了系统“位移”变化的主导者——翻译的“分子化运动”微观性与动态性的两大特点。由于具备这两大特点,翻译“分子化运动”与系统

之间互动而构成了一个有机互补的整体。翻译“分子化运动”对系统具有两大作用:从多元系统内部来看,翻译“分子化运动”的出现预示着系统内部将可能发生状态变化——从原来的“平衡状态”进入到一个“临界态”;从系统外在表现来看,系统在翻译“分子化运动”力的作用下,完成“位移”。我们可以从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些特殊翻译家以及他们的翻译思想与活动来具体对这一过程加以检测。

4.1 以“归化”为主的“五四”前翻译文学系统

从1898年严复提出“信、达、雅”的中国翻译话语开始,西方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不断通过翻译涌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从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与西方接触逐渐增加,民众与知识界对于西方文学价值有了新的体认,以往以严复式政治取向为中心的社会学翻译渐渐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其影响逐渐淡出,翻译的主流开始过渡到以林纾为核心人物的文学取向。但无论是致力于社会著作翻译的严复还是主攻文学翻译的林纾,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以“归化”为策略书写翻译文本,这种书写造就了“五四”前这段以“归化”为主要面貌的翻译史。在输入西方思想的动机之下,“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总的来看是政治化的归化策略”(朱安博,2009:83)。

显然,对于“五四”前,多元系统论可以为严复、林纾的“归化”的翻译策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持。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学在整个民族文学系统内属于强势文化,其地位稳固,居于系统的中心位置;翻译文学则在目标文学系统中尚处于一个次要的边缘位置,其进入是对文学系统提出的“挑战”。发起这一“挑战”的译者严复与林纾的目的在于使西方文本中的思想与内容被大众“接受”,以求输入西方思想,改造本土文化。因此,对于严复、林纾而言,以目标文学的规范对译文进行“归化”调适来接近读者是必然之举。多元系统论的推断与这段中国翻译史的实际是吻合的。

4.2 鲁迅的翻译思想与鲁迅翻译“分子化运动”的形成

“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有赖于翻译

为其提供新的话语资源。翻译文学系统中,过去以文言文为主的古典话语体系需要革新,翻译策略亟待转变。唯其如此,新的话语方式从翻译文学系统由内向外输出至整个中国文学系统才有可能。鲁迅是这项工作当之无愧的“先锋人物”。1935年7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明确表示了对翻译所取的“异化”态度:

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时何地,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的洋气。(南木,1983:45)

鲁迅(1983:5)认为“归化”是“削鼻剜眼”,他甚至为不成熟的异化欧式句法站队:“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的不顺口”(同上)。历史通过“白话文运动”向翻译提出了新的任务,鲁迅以其时代洞见与深厚的中西学养意识到了这一任务只有“异化”的翻译策略才能完成。正如与鲁迅就翻译问题通讯的瞿秋白(1983:9)指出:“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如果说严复、林纾的翻译目的是向中国输入外国语文的内容——它的思想与文化,那么鲁迅时代的中国则已经渐渐趋向于外国语文形式的输入,对语言形式的输入离不开“异化”。依据鲁迅的“异化”翻译思想所产生的新的句式、句法,乃至各种新的语言思维方式客观上赋予了翻译文学系统在特定历史时期建构中国现代语文的能力。

鲁迅的“异化”翻译思想是近代翻译思想的转折点,是对尚处于主导,还依然保持着历史惯性的严复与林纾翻译思想的突破与颠覆,在这样系统外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他以一己鲜明态度独立地与系统内主流发生对抗,这正是鲁迅翻译作为“分子化运动”的微观属性所在,鲁迅翻译的“分子化运动”也是这样形成的。

4.3 “五四”翻译文学系统的“临界态”与系统位移的确立

从系统内部看,在这一阶段,鲁迅翻译“分子化运动”的作用力已经显露,翻译文学系统内部已经处于“临界态”。虽然此时系统还没有发

生“位移”,但翻译文学系统内部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性质变化。“临界态”就是系统内部变化的结果。

我们知道,系统之间会相互排斥,而处于“临界态”的系统内部最主要的活动也是“冲突”与“争夺”。对处于“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系统而言,其内部“冲突”的矛盾焦点就是旧的“归化”翻译策略与新的“异化”翻译策略。鲁迅执“异化”一端,力图证明“异化”的诗学合理性。为捍卫“异化”,他直接参与了翻译话语的“争夺”,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牛奶路之争(朱安博,2009:92)。在这场围绕着“milky way”一词发散开来的“归化”与“异化”的角力是鲁迅“异化”翻译思想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的时期。鲁迅提出了大量“异化”的主张,他把“信”与“顺”对立了起来,把当时很多人借以表达“归化”的“顺”边缘化了。鲁迅的主张很可能包含了一定的“潜文本”,即“顺”的译文书写方式是扭曲、改变源语思想内容的“罪魁祸首”。在鲁迅的努力下,这场话语争夺的结果是翻译文学系统内“归化”的没落,整个系统在翻译策略上发生转变,进入了即将发生“位移”的“临界态”。

与此同时,整个翻译文学系统也由于鲁迅翻译“分子化运动”在内部施加力的关系而发生了位置的变化。翻译文学系统不再是“五四”前的“边缘”位置,它更趋向甚至占据了文学系统的中心。鲁迅自己的翻译作品为他所在时代以及当代读者广泛阅读,并至今发挥着中心辐射式的巨大影响力即是“位移”发生、形式库发生动态变化的一个有力证据。

5. 结语

多元系统论的提出使得翻译研究具备了一个宏观视野,但对于某些影响巨大的微观翻译现象,多元系统论显然缺乏解释力。这些微观现象体现了译者主体性,但却与多元系统论之间存在矛盾。本文以中国翻译史上出现的译者主体性与多元系统论之间的矛盾为切入点,提出翻译“分子化运动”的假设。我们认为翻译“分子化运动”这一概念具备两大特性:微观性与动态性,前者能充分观照翻译活动的译者主体性,从而使研究者得以在系统背景下充分描写译者以背离为特征的翻译活动,后者的

动态性则体现了这种翻译活动与多元系统之间的深层关联。正是翻译“分子化运动”使得多元系统在其内部状态上进入“临界态”，推动系统完成“位移”。它结合了译者主体性与多元系统论各自的优势又调和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从而提高了两者，特别是多元系统论的理论解释力。

从结构上来看，促成系统发生位移变化的外在因素，学界讨论的较多的有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经济等，但外在因素组成的系统似乎很难直接作用到翻译文学系统，外在因素是否有可能通过译者主体性这一中间环节以翻译“分子化运动”的形式最终推动了系统产生位移？这有待于学界通过对多元系统论进一步整合化研究来回答。

从翻译文学史研究角度来看，几乎整个中国翻译文学史都贯穿着这种翻译“分子化运动”。在与多元系统论的互补之下，我们有可能借助这一新概念重新梳理中国翻译史。以往对于翻译史的研究无论从历史上翻译家活动出发，还是从翻译作品的具体解读开始，很少能够深入分析推动翻译文学史演进的系统内部的“动力”问题。翻译“分子化运动”是系统内部推动系统发生“位移”的主导，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翻译文学史的推进，因而它也可能是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新工具。

注 释

- ① 赛义德在《理论的旅行》一文中提出了理论旅行的四个阶段，可参见 Said, Edward "Traveling Theory", In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pp.226-247。
- ② 多元系统论传入中国始于2000。2000年，张南峰、陈德鸿共同出版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一书收录了庄柔玉翻译的佐哈尔的重要文章《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2001年，张南峰与庄柔玉在《中外文学》上出版了《多元系统论专辑》；2002年《中国翻译》发表了张南峰“多元系统论”的译文。
- ③ 参见《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9期采访李文俊先生的一篇专稿。
- ④ 参见黄昱宁《翻译的归化与异化：再说“牛奶路”》，发表于2014年12月10日《文艺报》，第七版。
- ⑤ 庄柔玉译，选自《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陈德鸿、张南峰编，第118页。

参 考 文 献

[1] 陈德鸿、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2]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A]. 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论文集[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

[3] 蒙兴灿.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4] 南木. 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论文集[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 4-5.

[5] 彭勇. 系统和关系——重读与反思多元系统论[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3): 113-116.

[6] 瞿秋白. 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A]. 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论文集[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

[7] 邵璐. 质疑, 解构, 颠覆?——论多元系统论的悖谬、误读与误用[J]. 外语教学, 2004(4): 57-60.

[8] 王建开. 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9] 谢世坚. 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论的局限性[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4): 103-105.

[10] 谢天振.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 外国语, 2003(4): 59-66.

[11] 肖维青. 翻译批评模式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12] 于德英. 用另一只眼睛看多元系统论多元系统论的形式主义分析[J]. 中国翻译, 2004(5): 10-14.

[13] 杨柳. 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以多元系统论为个案研究[A]. 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C]. 2008.

[14] 朱安博. 归化与异化: 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15] 张冰. 蒂尼亚诺夫的动态语言结构文学观——《文学事实》评述[J]. 国外文学, 2008(3): 3-8.

[16] 张南峰. 多元系统中的规范概念[J]. 外国语, 2008(5): 64-71.

[17] 张南峰、庄柔玉. 前言: 多元系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 中外文学, 2001(3): 7-17.

[18] 查明建. 多元系统论的整合与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拓展[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 126-140.

[19] 庄柔玉. 用多元系统论研究翻译的意识形态的局限[J]. 翻译季刊: 2000(16-17): 122-136.

[20] Bassnett, S. &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1] Even-Zohar, Itam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A]. In Lau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reprinted)*[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2]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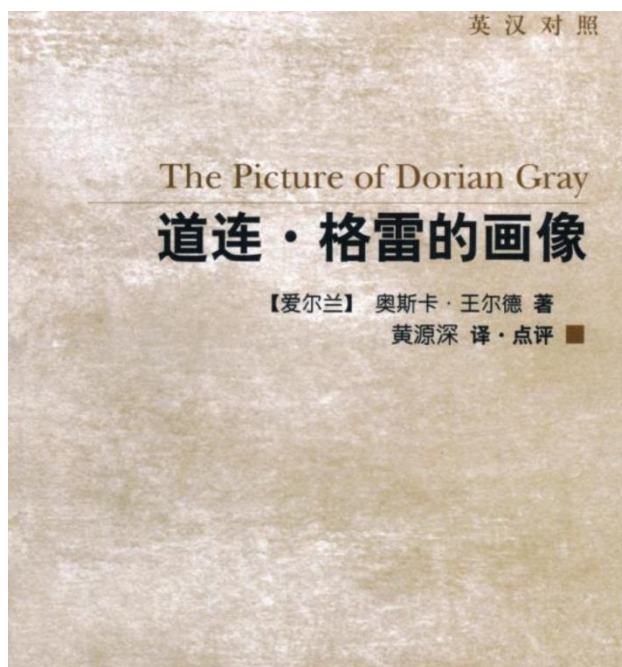
[23] Hermans, Theo.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on and Systemic Approach Explained*[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24] Said, Edward. Traveling Theory[A]. In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83.

[作者简介] 杜磊,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 文学翻译。

肖维青,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翻译教学、翻译批评。

[作者电子信箱] dulei@shisu.edu.cn; wqxiao@shisu.edu.cn



The artist is the creator of beautiful things. To reveal art and conceal the artist is art's aim. The critic is he who can translate into another manner or a new material his impression of beautiful things. The highest, as the lowest, form of criticism is a mode of autobiography. Those who find ugly meanings in beautiful things are corrupt without being charming. This is a fault. Those who find beautiful meanings in beautiful things are the cultivated. For these there is hope.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本期书目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Oscar Wild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美的变奏曲

上海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吴林璞

作为王尔德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在出版之时乃至之后的几十年间饱受非议,精神世界受到冲击的公众不仅对王尔德本人横加指责还迁怒到其亲人。王尔德的妻子曾说:“自从奥斯卡写了《道连·格雷》,就没有人和我们说话了。”王尔德凭借亨利之口,揭露了维多利亚时期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肆虐的种种丑态与伪道德。亨利本人尊贵的地位,所受的赞誉与阴暗消极的内心成对比,最好的诠释了伪道德三个字;道连永不衰老的容颜与其腐朽堕落的灵魂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道连·格雷的画像》既是王尔德从唯美主义角度从容地反叛资产阶级一次发声,也代表着他生平思想的精髓。

为大家不知道的是,王尔德是庄公忠实的粉丝。1890年2月,正是《道连·格雷》出版前的四个月,《演讲者》(The Speaker)刊登了王尔德一篇以“中国圣人”(A Chinese

Sage) 为题的文艺评论。与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学派相比，庄子代表的道家更注重自我发展与个性化教育，相当接近当今西方倡导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王尔德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更喜欢对身边人的缺点指指点点，而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进行自我教育。王尔德在自己另一篇极具代表性的散文《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中从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阐释自我发展的意义，毫不吝惜对个人主义的赞美。《道连·格雷的画像》中最重视自我发展的人无疑是亨利，他甚至将这种思想发展到了一种极端，即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这种思想对王尔德塑造道连核心性格的影响不容小觑。道连性格中极度重视自我的一面也可被视为这种思想的反面延伸。在亨利的教唆下，道连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美”，产生了永久保持这种外在美的贪欲，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灵魂去交换永不衰老的脸庞。将亨利以貌取人的标准奉为圭臬的道连开始彻彻底底灵魂的堕落。他嫉妒一切不会凋亡的美好。道连不知道的是，人离开了灵魂是无法生存的，他无法与灵魂彻底分离。他的灵魂虽然在他自己的身体里被压抑，但却在画布上找到了摆脱禁锢的方法。画布上的才是真正的道连，他的灵魂正在经历着“living death”。¹道连虽貌似潘安，引人注目，却再也无法与自己和谐相处；将灵魂封锁起来的道连是矛盾的，扭曲的。

世间之人食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欣喜，愁苦抑或思虑交替着占据我们的思绪。虽备受其扰却乐在其中，三杯两盏淡酒一醉到天明也全当一种洒脱。人们宁愿纠结着前进也不愿放弃情感的起伏，这种割舍不下的挂念或许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一个人在学会了和自己独处后，他的任务就变成了为他人而活，为自己挚爱的人和事物奉献时间和精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经历了严峻的现实，尽管饱经风霜，却焕发出一种自然的人道美，用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来形容再妥帖不过。然而，道连的爱情和他的外表一样，形式美掩盖了真心，因此，道连不是在变老，而是变丑；丑陋的根源是内心，与他所在意的外表无半点关系。

西碧儿·韦恩以近乎天才的完美表演赢得了道连的倾心，两人陷入热恋并迅速订婚。道连痴迷于未婚妻的才华，满足了他对爱情艺术一体化孜孜不倦的追求。然而，西碧儿在这段感情中付出了真心，对道连的无比真实的爱让她逐渐丧失了对表演事业的野心，对她来说找到了爱情以后任何表演都会变得肤浅做作。可以说，这段爱情只在头脑中满

¹ Gall, J. (1992). THE PREGNANT DEATH OF DORIAN-GRAY+ THE BLURRING OF DISTINCTIONS IN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BY WILDE, OSCAR. *Victorian Newsletter*, (82), 55-58.

足了道连的幻想，却在现实中给了西碧儿莫大的安慰和满足。

为了向巴兹尔和亨利炫耀女朋友的才华，道连邀请巴兹尔和亨利观看西碧儿的演出。西碧儿大不如前的演出让道连觉得在朋友面前失了面子，对其失望透顶，以至粗暴地对待她，毫无半点怜惜之意。西碧儿当晚因绝望自杀。当爱情让西碧儿失去了舞台上的无限光芒，变成憧憬爱情，以心爱的男子为全部的平凡女人时，她也失去了道连目的并不纯粹的爱。这种爱出于猎奇，终于厌倦，如暗夜暴风雨般剧烈，骤然掀翻一名落入凡间女子的孤舟；呼啸而来的寒风还顺势卷走她对生的渴望，化为画布上可怕的痕迹，进行无声的指控。

西碧儿去世后，巧舌如簧的巴兹尔劝说道连把这看成一种“为艺术献身”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行为。就这样，道连逃过了内心仅存的一丝自责，越过了良心，用厚厚的画布遮起不断变丑的画像，继续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如果说道连一点自责也没有，也并不符合实际，但这种自责与其出于同情心不如说是日渐狰狞的画像给他的冲击。他一个对形式美如此重视的人只有在形式美遭到毁灭的时候或许内心才会有些许波澜。

道连所有的快乐和痛苦都围绕着自己，高度重视自我感受，哪怕是在自己伤害他人的时候。当他发现自己被一种罪恶感缠绕的时候，会想尽办法从中脱离。其实他能意识到这种罪恶感也是其灵魂依然存于体内的标志。道连在画像前用灵魂交换美貌的交易从未成立。灵魂就像基督教里原罪一样伴随着每一个人的出生，成长，变老；把灵魂驱逐出去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在遇到亨利之前，道连是一个外表和灵魂完美契合的小伙子。画家巴兹尔视之为浑浊世上的一汪清泉。灵魂分裂的道连更像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笔下的海德和哲基尔，挣扎在双重人格之间无比痛苦。他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痛苦，便归咎于画家巴兹尔。看着画像中面孔逐渐狰狞，心中对巴兹尔的仇恨便增加一分，殊不知这种分裂源于自己人格上的软弱。

杀害画家巴兹尔后，道连的帮凶负罪自杀，从此便没有人再知道这个秘密，而西碧儿的弟弟长大后来找道连复仇却阴差阳错地被误杀，这样，道连的两桩罪恶都可以永远随着灵魂陷入黑暗的深渊。然而，道连的内心却越来越不安，他“双眼噙满了泪水”，意识到自己的堕落，有意悔改。康德的善恶论认为理性会激发人的向善禀赋。道连的理性不断挑战着人格上的软弱。演出当晚，向西碧儿肆无忌惮释放恶的因子后，道连随即懊悔不已；听到西碧儿自杀的消息后，他痛苦地说“她本是来拯救我的，没权力自杀。”向善的禀赋不断呼唤了灵魂的回归，道连尝试顺应本心，拯救自己的灵魂，摆脱亨利的

控制，对自己能使画像恢复如初这一点深信不疑。

这种救赎具体表现在道连对待另一次爱情的态度，与乡村少女海蒂的爱情刚刚开始就被他切断了。道连甚至想到与之私奔，考虑到这会影响到她的名声便放弃了。道连一生猎艳无数，最为有名的两位女主人公就是西碧儿和海蒂了。书中对海蒂的描写并不多。道连主动放弃了这次的猎物，然而画像识破了他的动机，并没有如他预想的那样逐渐“自我洗白”，反而越来越丑。这其实也是在说，灵魂一旦被邪念染指，那个痕迹就会一直留在那里，几次矫揉造作的蜕变并不会改变其堕落的事实。

绝望懊恼的道连最终刺向了实为自己的画像，企图毁灭这世界上暴露自己阴暗面的唯一证据，不料却还是以生命偿还了曾经对不起的人和事。画像完美如初，而倒在地上的道连，丑陋无比，难以名状，证实了多年来流传于坊间的“流言蜚语”。道连波澜不惊的外表下脆弱龌龊的内心得以公布于世。结合康德善恶论，这也许是受向善禀赋驱动变得越来越矛盾，越来越绝望的道连最好的归宿吧。

王尔德笔下的道连，所有爱他的，崇拜他的，对他好的人都因他而落得悲剧结局。他却执迷不悟，对亨利不怀好意的话深信不疑，狠心践踏画家巴兹尔的一片苦心。巴兹尔即使最后一刻，看到面目全非的画像时，依然对道连抱有希望，恳求道连和他一起祈祷。一个人的堕落不仅仅是自己的事，会辜负爱你的人的一片真心。汉代朱浮在《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中有云，“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

《道连·格雷的画像》全书始于亨利和巴兹尔关于道连未来人生道路走向的争吵，也暗示了二人从头到尾对道连的人生产生的影响。两人截然不同的立场实为内在矛盾的道连的外在驱动。画像的创作者巴兹尔认为亨利的话看似与众不同，充满道理，实则混淆视听，披上了伪善的外衣，极具诱惑性，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他就担心纯洁如白纸的道连会受其玷污。果不其然，尽管巴兹尔对道连有着无限的迷恋和信任，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道连听亨利的话，按照亨利的指示去做，活成了亨利的影子而不自知。

亨利和道连的关系就像投影仪和屏幕一样，亨利内心的想法通过道连作用于这个世界²。亨利虽然地位尊贵，举止得体，内心却对所处的上流社会，接触的人情世故无比厌倦，然而他既无法借自己之口直接说出这一切，也无法以实际行动去反抗，这其中也有作为资产阶级一员，舍不得放弃既定利益的原因吧。亨利和道连一样，作为资产阶级上

² 关贞兰. (2015). 《道连·格雷的画像》中亨利与道连间的“复影”关系.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年05), 75-76.

● 主题书评

层社会的一员，有着与生俱来的软弱性，但是年岁的增长让亨利对这一切麻木。以偏激犀利的语言发泄情绪，吸引他人的注意，不仅是他自欺欺人的一种方式，也是其已经麻木不仁但仍有不甘的灵魂进行的虚假的反抗。因此，道连是亨利受压抑丑陋自我的外化。

亨利是个把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奉为圭臬的人。尽管人们知道他的理论有毒，却还被吸引，除了其叛逆犀利的语言足够博取眼球外，所处大环境这一要素也举足轻重。亨利伯爵的一举一动都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准；换言之，尽管他让人看到的是他虚假的外表，毫无疑问的是，人人都希望成为他这样的人。就像巴兹尔说的那样：“你很了不起虽然从来不言道德却也从不做错事，你的玩世不恭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

然而，道连与画家巴兹尔的关系远远复杂于其与亨利“投射-映像”般的相互影响。曾经有人就《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神话原型进行解读，认为画家巴兹尔是救世主耶稣和艺术缔造者皮格玛利翁的化身。亨利伯爵曾这样评价巴兹尔：“优秀的艺术家只存在于他们的艺术中。”巴兹尔带着对道连的无限挚爱创作了这幅画像，然而，和其他艺术家不同，巴兹尔不想让其他人看到这幅画，因为他在画中过度投入了自己。让更多的人欣赏这幅画固然可以让其名声大振，但一向在他人严重“行为怪异”的巴兹尔会感到心底的神圣领地被人侵犯。当他看到画像中面目全非的道连时，大呼：“主啊，我崇拜的竟是这样的东西。”尽管伤心失望，他还没有放弃对道连最后一丝希望，拉着他祈祷以减轻罪恶，就像从耶稣口中说出的那样：“哪怕你的罪恶殷红似血，我也能将它们洗刷得洁白如雪。”当这最后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也行不通的时候，巴兹尔只能像耶稣一样，“用受难的方式感动犯有罪恶的人心，相信在苦难中自我实现的救赎方式，道连魔鬼般的灵魂在巴兹尔用生命去支撑的执着和圣洁的信仰下自惭形秽，只能将自己丑陋的身躯从美的画像中抽走，使作为救世主的巴兹尔那追求艺术美的永恒灵魂从自己亲手创作的画像中的得以复活。”

巴兹尔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皮格玛利翁一样，爱上了自己的作品。这种执著的情感来源于对艺术和美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超越了世俗的眼光，甚至高于他们自己的生命。巴兹尔认为道连打开了他艺术创作新世界的大门，没有道连就没有这幅画像。画家巴兹尔的赤子之心和艺术道德才是这幅画像最迷人的地方，画家本人却并不自知，反过来更为这幅画像增添了神秘感。

巴兹尔临死时对道连的自我剖白可被视为其深藏心中多年的秘密，是他不愿让人从画像中发现的，即他对道连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从巴兹尔单方面来讲，带着一丝暖

● 主题书评

味的同志情谊，“确实，我对你的这种浪漫的思绪超过了作为一个朋友应有的限度。我一生中从来没爱过一个女人。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刻起，就着迷于你散发出的人格魅力，无法自拔。我非常喜欢你，这一点我必须承认，这种喜欢是疯狂的，荒谬的，肆意流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妒忌每一个和你说过话的人，我只想属于我，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是快乐的。无法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沉浸在艺术里去感受你。你一定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我自己也并不理解这种行为。”

联系时代大背景，即使是在今天以包容多种文化著称的美国，对同性恋，人们也还在不断地接受过程中。维多利亚时代同性恋更是无法想象的事。尽管存在同性恋，他们考虑到舆论压力及被公众异化的风险，也必是不敢公之于众的。

王尔德的作品和他本人一样，具有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学者们一直试着将《道连·格雷画像》编入某一文学门类，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却越来越困惑。英国《每日记事》报的一位读者认为《道连·格雷画像》类似于法国的颓废主义文学，毒害着人们的精神；一些基督教出版刊物则高度赞扬这本书，认为它是“道德的典范”和“高尚的寓言故事”；纳撒尼尔·霍桑之子朱利安·霍桑认为其属于小说或是浪漫史，但最后他改变了主意，归之为寓言，并认为其“不同于一般的英国小说”，“是一个好的开端”。现代评论家同样困惑于这本书的分类，不同于前人的是，他们不再局限于从道德视角分析这本书，同时也出现了“这本书是多种类型的混合体（hybrid）”的说法。然而，最受欢迎的还是“童话”和“寓言”³。

或许，这本书告诉我们的道理比它属于哪种体裁更重要。人性的善恶不是绝对的，对一个人的评价更不应局限于此。丑陋无比的道连曾经是一位天真烂漫的翩翩君子，因为贪欲，陷入了一辈子的纠结；傲世轻物的亨利内心深处每一缕轻蔑都来自他对现世的失望，因为懦弱，他从不站到反对者的阵营；真善美的画家巴兹尔在他人眼中遗世独立，异常怪异，因为道连，他拥有了一生中最大的弱点。对《道连·格雷的画像》的思考还在继续，甚至其中的道理也无法用具体的一二三点来概括，却无比深刻地种植在一代代读者思想的田野上，他们心有灵犀，无需口耳相传。

³ Clausson, N. (2003). "Culture and Corruption": Paterian Self-Development versus Gothic Degeneration in Oscar Wilde's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9(4), 339-364.

道连·格雷：一个自恋者的失败疗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唐悦

王尔德的代表作《道连·格雷的画像》以其狡黠智慧的语言、独特的唯美主义创作笔法以及丰富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成为评论界津津乐道的传世经典。而主人公道连·格雷的心理发展状态则引发了精神分析领域的诸多关注，许多评论运用弗洛伊德的自恋情结和拉康的镜像阶段等精神学理论探讨了道连的自我认同困境，分析了他的悲剧人生。显然，道连对自我美貌的沉迷，离经叛道而自私自利的个人生活以及他对画像嫉妒、痛恨又依恋的复杂感情展现出了一个身患自恋病症的精神病人的独有特点，而这也为读者窥探自恋者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文学案例。

溯源自恋情结一说，纳西索斯神话可谓最为著名的范本。纳西索斯未出生时，先知忒瑞西阿斯便对他母亲预言“纳西索斯将活到成熟的老年，假如他永远没有认识到自己。”青年纳西索斯美貌异常，在无情地拒绝了回声女神的迷恋和其他求爱者的追逐后，他受到了天神的惩罚，阿尔忒弥斯（也许出于另一种自恋性的嫉妒）使纳西索斯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在爱而不得的痛苦中纳西索斯用匕首结束自己的生命，化为一支水仙花。弗洛伊德将此与内驱力力比多（Libido）相联结，将其作为力比多通过撤回对象投注而倾注于自我的过程，“自我应该被视为一个力比多的大容器，力比多因此被派送到对象上，而且随时准备吸收从对象逆流回来的力比多，自恋是以一种任何对象投注都无法超越的力比多的淤积形式出现的⁴。”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恋并不是一种倒错，而是利己主义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力比多的补充，是力比多自我性冲动的一种表现形式⁵。”弗洛伊德的主张构成了客体关系与自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随后，英国客体关系理论创始人克莱因注意到婴儿内心存在的死本能和内在运动的破坏性，使得被投射的外部客体扭曲化，因而自我活跃成为了一种免于破坏的防御性机制。而费尔贝恩则通过分裂样个体的现象性描述，认为当客体（往往是情感退缩的母亲）不可及时，婴儿转向内在并把自体作为一个感官的客体。科胡特则认为我们通过与自己有共情关系的人物维持自体的活力，建立起一种外部与内部和谐共处的平衡关系，而童年期这种关系的失败是所有病理心理的来源。澳大利亚精神分析学家赛明顿在其《自恋，一个新理论》一书中为我们

⁴ 曾志，《浅论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年第7期第78页

⁵ 张传开，章忠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评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 第117页

探索自恋情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他认为自恋的痛苦来源于人生早期对生命给予者的拒绝，而生命给予者是自体与客体建立联结的部分，是由自体的不同侧面和外在生命的支持性客体所组成的。在决绝了这种与外界的联结后，自体转向内部，丧失了真正的创造力和行动力，并被分割为许多矛盾的亚自体，它们彼此冲突，无法整合为统一人格。本文将从赛明顿的理论解析《道连·格雷的画像》，揭示小说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下隐藏着一个自恋症患者失败的治疗历程。

“自体在天性上就是关系性的，而自恋的核心就是对关系的憎恨，自恋运行的方式之一是破坏分离，被自恋暗流统治的人们，他们自己与他人的分离是失败的⁶。”换句话说，自恋者不认同差异，故意忽视与自己相左的思想，他们会认为其他人和他们想的一样，既然没有这种个体间的“异”，那么也无从谈起真正建立起自体 and 独立客体间的交互关系，因为客体在他们眼中是模糊的，并没有与自己解离。在道连·格雷与外部世界的早期交流中，有两个人成为了他社交圈子的核心，一个是画家霍尔华德，另一个是亨利勋爵，前者说“只要我活着，道连·格雷的人格将左右我⁷”，而后者则通过言语的魅力和享乐主义的诱惑深深影响了道连的灵魂，因此这两个人并不能与道连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分离，他们都与道连本身的性格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其说他们在道连的人格发展中扮演了独立的角色，倒不如说他们是道连内在人格的两方面，谨慎的自我与放纵的本我之间强烈的交锋。对于一个自恋患者来说，这使得他始终处于一个封闭孤立的状态，他依旧沉迷于自我世界，而没有接受外部对他的投射，既然缺乏外部的联结来照耀他内心深处的复杂洞穴，他既忽略了内心存在的其他人格选择，也缺乏意识去构建与外部的关系，因此道连对自我的认识是不全面的，直到他人生中第一位外在客体——西比尔·文的出现。异性恋情充当了道连第一段治疗历程中的关键因素。西比尔·文在认识道连之前也是一位自恋患者，她在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沉浸于角色的爱恨情仇而无法体会真实世界中的感情，而道连则沉迷于西比尔的表演中，形成了两个自恋者看似开放实则狭隘的情感交流通道，正如福柯所说“这种把自己的身体、行为、感觉和激情，把他不折不扣的存在都变成艺术作品”本身就体现了超级自恋的审美意识形态⁸，这两人的爱情犹如迷恋于幻想艺术中的纳西索斯和疯狂地跟随爱人身影的回声女神，没有实质的对话且游离于现实世界，在戏剧表演中互相追逐着虚幻的自我。但爱情让西比尔从自我的世界中

⁶ 赛明顿，《自恋，一个新理论》，吴艳茹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⁷ 奥斯卡·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黄源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

⁸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 主题书评

撤退了，她选择了道连成为她的生命给予者，也就是与外界建立关系的支持性客体，她不再满足于在戏剧的幻境中达到自我愉悦，她提出通过婚姻这一世俗媒介来营建情感的互动。尽管面临巨大的阶级差异和丑陋的社会现实，西比尔仍然希望道连能成为她通向更广阔社会的一座桥梁，她希望在彼此的扶持中继续勇敢地追求美。这一选择展现了西比尔自我诊疗的努力。从道连的角度看，这时的西比尔也是他的第一个生命给予者，她是一个完全与自体分离的异者，能给予他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人生选择。这本是一个良好的双向选择机会，但道连却残忍而无情地拒绝了生命给予者的主动援手，他对艺术美感所谓的执着追求实际不过是遮掩，在他优雅的面具背后深藏着自恋者对外界的恐惧和怀疑，为了避免不确定的外部世界对自己可能造成的威胁，道连选择拒绝来防御自己，但同时切断了与外界联结的机会。对西比尔而言，在寻求唯一的生命给予者失败后，她丧失了尝试的勇气和动力，以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重新退回到自己那奥菲利亚般的自我幻想中，在忧郁和焦虑中彻底放弃了与外界对话的通道。西比尔的死给道连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其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他在悔恨和痛苦中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私的、不道德的一面，暴露出了他无意识中始终躲避着的亚自体，而画像的变化就是他亚自体的外部投射。

赛明顿认为自体由许多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有能力作为一个分离独立的小个体来运作⁹”，当一个人的情绪或精神出现问题，通常就是他对这些部分的整合出现了问题，这些亚自体在相互作战，使自体处于不统一的痛苦之中。当道连知道西比尔自杀后，他惊讶的发现了自我性格中残忍自私的一面，这是对他长期以来的自我认同的极大挑战，他希望将这种不和谐的因素压制甚至消除，而这时我们发现画像产生了变化，倒不如说画像就是道连反抗这种矛盾亚自体的承载物。他把对自我人格中的丑陋部分投射到画像中，让画像代替他承担性格中的缺陷及其带来的后果，而自己就可以心满意足地回到自我完美的自恋情结中，画像帮助他重新达到了内部结构的平衡状态，而这更加重了他的病情，因为他被局限于画像带来的抚慰中，看不清自己精神变化的真实景象。抛弃了生命给予者的道连，随即丧失了创造力和行动力，因为他缺乏与他人的真正联结因而发挥不了自己的影响，也接受不到他人的帮助。在人际网络交织的社会关系中，道连犹如一座孤岛，困顿于自我迷恋而无法将情感和行动施加于他人。他已经失去了真实感受世界的的能力，变得麻木不仁；他口中的美变得越来越虚假，他与曾经天真纯洁的本性已相去

⁹ 赛明顿，《自恋，一个新理论》，吴艳茹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28页

甚远。为了在社会中继续获得地位和生存的条件，这样的人必须重新获得行动力，一种方法是通过感官刺激唤醒内在活力，激发内在能量而建立情感联系。于是，道连逐渐纵情声色，在酒色生活中不断沉沦。这些感官上的持续抚慰就如兴奋剂一般让他持续保持精神的愉悦，替他遮掩人格中无法整合的丑陋，从而保持道连自我认同的连贯统一。他缺乏正常的人际交往，只能在这种声色刺激中不断获得行动的能量，获得施加社会影响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他明知有错却依旧要误人子弟，因为只有拥有行动能力的人才能在社会中保持存在的意义。甚至当霍尔华德发现了他的画像，并将他人性中极度憎恶的丑恶亚自体揭示出来时，他选择杀人这种可怕手段努力掩盖住自体的矛盾性，以自欺欺人的态度恢复了对自体的认同。而在这杀人的过程中，鲜血和暴力的刺激让他感到了非同一般的自主权，他不再是霍尔华德笔下那个循规蹈矩、等待他人作画的模特，而是有力量将创造者摧毁的主体。但画像的存在仍然是个问题，它不断在提醒道连，他不像自我想象的那么完美，他是一个自我分裂又与外界隔绝的主体。在这种犹豫的自我质询中，道连遇到了第二个生命给予者，那就是詹姆斯·文。

相比他的妹妹，詹姆斯·文是一位不请自来，粗野暴力的生命给予者，更像是入侵者，他企图与道连建立的关系是基于仇恨。但从客观角度说，任何生命给予者的到来都会带来新知识，只要建立与差异性客体的相互关系，那么道连的自恋就有好转的可能性。但不幸的是道连再次选择了逃避，詹姆斯的意外死亡让他感到安心。令他庆幸的是：胁迫自己承认自体丑恶部分的外部力量消失了，他的生活并没有遭到打扰，他又可以退回到自我欺骗的安乐窝中。但是这次逃避由于对道连自身生命的威胁而对他产生了全新的影响。他首次认识到假如拒绝协调内心善与恶两种不同人格，也许会导致自体本身的存在面临危险。内心的极度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画像上的狰狞使得他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因此道连提出了“做好事”，他希望通过做些好事得到心灵的安慰，尤其是将恶的亚自体尽快与另一部分协调起来，免得自己遭受另一次生命危险。但正因为这种行善的意识只不过是自体防御机制的变体，依旧是自我依恋的发展，而不是真正为他人考虑的社会交际行为，所以他的行善反而暴露了他更无法接受的部分——虚伪。他曾经因为厌恶自己的自私残忍而出现自体的分裂，为了掩盖分裂带来的不完整性，他将厌恶的部分投射到画像中，自己免于自责；而如今他看似浪子回头但却发现衍生出又一令人厌恶的部分，他才终于明白这种防御只能使得病症不断恶化，加剧自体的分裂。抱着这样一种绝望的心情，道连正经历着内部谴责的消极过程，他开始求助于极端的方法

● 主题书评

一谋杀画像，强迫所有自我厌恶和否定的部分全部结束，这种极端的否定手段虽然使得自体中一切威胁自体存在的矛盾部分消失，但同时也是对自体内部相互投射的否定。在自杀中，他既没有选择与外部生命给予者建立联系，也放弃了内部自我调节的途径（尽管这种调节势必最终走向毁灭），于是他的行动源泉被切断了，他在自我内部和外界客体两方面都没有达成和解，道连最终在死亡中终结了自己的精神问题。

许多研究表明，自恋情结的产生与童年时期的创伤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书中虽然只是寥寥几笔，但我们依旧可以观察到道连的家庭悲剧：他童年丧父的不幸经历和与外祖父的紧张关系，想必在他的童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也是他拒绝与外界沟通而逐渐形成自恋症的重要原因。他描画的完美自我与实际的多重亚人格相互冲突，而正是认识到这一矛盾的人格体才使道连受尽了精神折磨。正如忒瑞西阿斯所说，正因为发现了自己的不完整性和不同一性，道连·格雷才失去了活到成熟老年的机会。他虽然保留住了青春却未能完成成熟的自体整合，只是停留在童年形成的病态情结中。他没有抓住生命给予者带来的治疗机会，而在自我尝试的内部协调中也无法完成自我治愈，最终只能在自杀中结束这一痛苦而失败的自恋症疗程。

● 资讯长廊

『上外博士沙龙主讲人推荐书目选摘』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2

页数：86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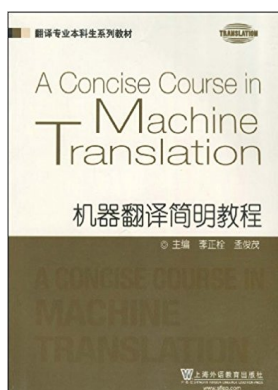
ISBN：9787100083263

【第30期博士沙龙静湖读书会分享人叶子推荐】

《语言研究的数学方法》(芭芭拉·帕赫蒂, 爱丽丝·特缪伦, 罗伯特·沃尔)

【内容简介】

本书是计算语言学方向最著名、最常用的教科书之一。由欧美当代顶尖数理语言学家联合力作, 欧美大学语言学系经典教材。涵盖离散数学几乎所有内容, 尤其包括和语言研究密切相关的部分。全书分为五部分, 分别为: 集合论; 逻辑和形式系统; 代数; 作为形式语言的英语; 语言、语法与自动机。本书深入浅出, 实例丰富, 作者还精心设计了大量练习, 并在书后附详细的练习答案, 帮助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摘自 亚马逊)



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

页数：303页

ISBN：7544614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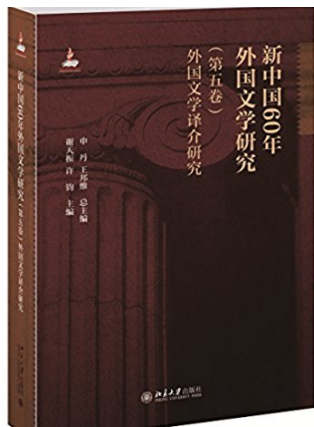
【第31期博士沙龙静湖读书会分享人许伟推荐】

《机器翻译简明教程》(孟俊茂 李正栓)

【内容简介】

《机器翻译简明教程》是机器翻译的入门导读教材, 主要用作翻译专业本科生教程。《机器翻译简明教程》也可供对机器翻译感兴趣, 欲从事计算语言学、机器人语音对话、大型数据自然语言查询等领域工作的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或作为使用机器翻译系统的人员的培训教材。《机器翻译简明教程》内容包括机器翻译概述、机器翻译类型介绍、基于转换的机器翻译理论、基于转换的机器翻译系统、基于中间语言的机器翻译理论和实践、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理论和实践、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理论和实践、译文处理、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相关知识、机器翻译的资源及其建设、机器翻译评价以及机器翻译应用前景和发展方向等; 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机器翻译当前最主要的理论和方法, 并特别注意汉语的计算机处理问题。(摘自 亚马逊)

● 资讯长廊



【第 32 期博士沙龙静湖读书会分享人梁新军推荐】

《新中国 60 年外国文学研究（第五卷）：外国文学译介研究》（申丹）

【内容简介】

《新中国 60 年外国文学研究（第五卷）外国文学译介研究》运用比较文学译介学的研究视角，通过对新中国建国后 60 年间外国文学译介总体情况的梳理，揭示出影响乃至左右新中国外国文学译介走向背后的诸多不为人察觉的因素，同时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翻译与外国文学经典的形成、翻译与世界文学地图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摘自 亚马逊）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页数：376 页

I S B N : 9787301185544

『上外博士沙龙主讲人最新学术成果选摘』

- ◇ 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宋炳辉. 东欧的意义及其东欧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
[J]中国比较文学. 2010 年第 4 期
- ◇ 杨淑华. 先锋小说家马原小说叙事中的形式借鉴与意义追寻
[J]外语研究. 2014 年 04 期
杨淑华. 西方批评话语的译介和中国形式主义批评话语的构建
[C]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议论文集. 2014 年
- ◇ 叶舒宪. “丝绸之路”前身为“玉石之路”
[N]中国艺术报. 2013 年
叶舒宪. 考古新发现：尧舜禅让可能是假传的
[N]解放日报. 2017 年

《言思录》第八期征稿启事---《别让我走》

上外博士沙龙电子刊物《言思录》(第八期)“主题书评”版块现面向广大研究生同学征稿,旨在为促进校园文化建设,拓宽学术视野,推动学术思考与创新。本期书目为《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是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创作的长篇小说,2005年出版,这是石黑一雄的第六部小说;¹本期书目由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张金凤教授推荐,书目及作者及推荐人简介如下:

书目简介

《别让我走》讲述了一群克隆人的生活经历和他们作为人体器官捐献者的故事。从生命伦理的角度对小说予以解读,可以发现人类的克隆人项目隐藏着某种阴谋,人类肆意取走克隆人的器官是对其尊严的伤害,也是对其生命的漠视。小说谴责了人类利益至上的狭隘思想,倡导在克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必须体现出伦理的诉求,要善待生命,敬畏生命。²

作者简介

石黑一雄,1954年11月8日生于日本长崎,日裔英国小说家。1960年,石黑一雄随家人移民英国。曾就学于东安格里亚大学和肯特大学。石黑一雄与鲁西迪、奈波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以“国际主义作家”自称。曾被英国皇室授勋为文学骑士,并获授法国艺术文学骑士勋章。³

推荐人简介

张金凤,上外博士沙龙第275期主讲人,1992年和1995年获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2004年获北京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2016-2017年剑桥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学术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中西文化比较。

请有意投稿的同学以征稿书目为读本撰写书评,或者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和感想,针对此书的某些内容和章节,撰写文章。注:征稿不限专业,诚邀各专业的同学撰稿。

投稿截至时间:2018年5月31日。投稿邮箱:sisusaloon@163.com。语言:中文。文章长度:不少于3000字。

被录用者的稿件将于《言思录》(第八期)刊登,并有专家点评。同时,作为感谢,上外博士沙龙将提供精美纪念品一份。

投稿同学请在文章最后写明个人信息,方便后期修改、交流等联系沟通,包括:姓名、学校、年级、专业、联系电话、邮箱地址。

上外博士沙龙《言思录》编辑部
2018年1月

¹ 苏坤,黄莹.论语用预设 在石黑一雄作品《别让我走》的语篇功能[J].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01期

² 李维屏主编:张和龙执行副主编,《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2[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04,第87-88页

³ 【英】石黑一雄著 朱去疾译.《别让我走》.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1:封面折页